

两难决定得有人作

伪装成甲虫的微型无人机潜进房间，发现恐怖分子头目都在，正装设自杀炸弹背心，人弹准备自杀视频。不能派部队进去，因为此地被激进武装控制。还好，天上正在监控的“猎食者”装有两枚地狱火导弹。问题是：发射还是不发射？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正在房子外卖烧饼。

《天眼》（Eye in the Sky），又一部十二怒汉式电影，但这次放在了无人机反恐的新叙事中。如果你以为在这场算计中，小女孩的生命被完全忽略不计，那就错了。除了最后按下发射键，军人、特工和政客们确实尽力想挽救小女孩的生命。各种动机都出现了：免责、道义、效用、良心。有人只想打，有人想打也想救小女孩；有人只想免责。有人关注政治后果，有人重视打击效率。有官僚主义，皮球层层往上踢，还踢过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也有英雄主义，现场特工智勇兼备，无人机操作员良心抗命。并不是每个人择一而从，每个人在上面的菜单中来回切换，时常互易位置。

这是个不可能正确的决定：发射导弹则无辜小女孩成为附带伤亡，其概率是65%；不发射导弹则两个携带自杀炸弹的恐怖分子可能造成80人的伤亡，概率不明；孰轻孰重？

当人们在彼此不兼容的多个坏决定中必须作出选择时，说服对方其实只需要做到三点：第一，洞察对方事实上很渴望被说服的内心；第二，但如果你施压强迫对方改变立场，他往往会变得更加坚持；第三，你要给对方一个改变立场的理由，如果对方在两难选择中已近绝望，会抓住这根稻草。这就是博弈论大家托马斯·谢林说的聚焦点，当僵局中的人们看到聚焦点时，他们会迅速站到你想让他们站的那个队上来。

电影中，行动指挥官、女上校命令精算师操纵数据，将小女孩伤亡概率从“不可接受的”65%下调到“可接受的”45%，降到决定的阈值以下，提供了聚焦点。部长假装相信它，无人机操作员没有理由质疑它，其他人精疲力竭，既不想承担放跑恐怖分子的后果，也有一个对外免责对自己良心撒谎的借口。

导弹射出了，恐怖分子死了，小女孩死了。

小女孩该死吗？绝不。决定错误吗？不知道。惟一确知的，是命运的齿轮已作不可回逆的转动。

在这次行动中，女指挥官是惟一目标清楚，从未动摇，坚持到底，并在最后时刻拿出解决方案的那个人，不惜作弊。

现实是由不讲理的那些人改变的，因为讲理的人还在忙着适应现实。

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常态？

中国人习惯了8%以上的高速增长，以为这才是常态；所以当近年开始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一般都以为这是指相对于8%的旧常态而言要承受“一定程度的”增速下降：先稳步放缓到7%，然后每年逐步放缓比如0.5个百分点，然后在5%左右的水平上长期增长。因为习惯了8%以上的高增长，接受这个程度的“新常态”，已经是人们在态度上的重大调整。

但这仍然是太乐观。让我们来看看别人的新常态。

两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一位是前财长拉里·萨默斯，另一位是发展经济学家普里切特，2013年发表论文，研究全世界各种经济体在经历高增长（他们将高增长定义为4%以上）后，会发生什么。

他们发现：在发生过的70次经济高增长中，只有4次随后出现增长加速，其余都是显著下跌；而所有超高速增长（定义为6%以上）后，都出现超过5个百分点的断崖式下跌，然后再慢慢恢复，保持在2%到3%的长期增长水平上。

作这个简单的横向比较可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之新，不是新在承认中国经济增速要下来，而是新在试图打破这70个过往案例的常态：一方面要拒绝剧烈的下滑，另一方面最终进入长期增长状态的时候仍然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目标是比其他国家的常态要高出2个百分点，并以此目标来倒推政策设计。

这增长缺口意味着什么？

到目前为止，就业不是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债务杠杆](#)率持续攀高，现在又多了一个[资产泡沫](#)挑战。所谓M1增长快于M2，货币不进实体经济，不是[实体经济](#)的错，也不是银行的错。马儿就能跑这么快，它已经吃饱了，强喂它草料还有什么用呢？

近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巴罗也有类似分析。巴罗预测，中国人均GDP从2015年到2030年的增长率是3.5%，这比官方的预测值要低2个到3个百分点。巴罗说这会是最大的挑战：如何将经济增长的理想与经济增长的现实一致化。他认为，中国如能保持3.5%的人均GDP增长，就已经很好，足以在未来20年内将中国送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何不把过分乐观的增长目标降到现实水平上来呢？这将使经济政策保持在可长期持续的轨道上，并化解崩断的风险。

加减法

我们失去的只是旧生产方式，获得的将是一个新世界

在中国生产内容的诸多不容易中，这一条很气人：你生产，他来偷，生产多少偷多少。偷得理直气壮，社会不以为非，视作好商业模式。

怎么办？

第一，降维攻击，把抓小偷的成本降到小偷偷你的成本一样低。

打官司不可不用，不可轻用，耗时耗力，法庭判决难测，执行成问题，即使赢了也没几个钱，侵权者以逸待劳，很难感受到痛苦。

去打对方的联络电话，托关系找到对方负责人，要他停止侵权，行吗？

他偷你的文章，给你打过电话联系版权了吗？他找你商量过吗？没有，直接就偷。那为什么你不直接在微信朋友圈、微博开骂？他敢偷，你就敢骂。最重要的是，要点名到个人。机构没有羞耻感，侵权的事总是人干的，从机构负责人的名字往下，到直接责任人，点一串名下来。互联网有永恒的记忆，他偷一篇文章，却要永远吊在耻辱柱上蒙羞。何必呢？

降维攻击是减法，光减法不够，还得有加法。

第二，内容的生产与消费即期化，自己的创造自己马上变现，去中介，去链条，从而也大幅降低被偷的风险。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但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后，在“值乎”和“分答”快速进化的创造中，内容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生产即消费，已露出一丝端倪。如果新世界彻底打开，还有小偷什么事呢？

第三，内容服务化。依托于高质量内容的社群，往往有强大的自我认同感。我最近出书《为什么我们总是看错人》，通过一个有数百万成员的社群首发。淘宝上立即出现了大量盗版，但完全不成气候。社群销售速度极快，没有给盗版留下时间窗口；成员有高度认同，以购买正版为荣。有此两条，盗版不成气候。

互联网近年全面渗透生活之后，早年间一切活该免费的逻辑已经远去，付费成为大家的新习惯。人们有能力、有意愿为优质内容付费，而内容生产者与消费者空前接近，你做得好，他就付钱。这是内容生产者最好的时代，我们失去的只是旧生产方式，获得的将是一个新世界。

与不确定性相处的三定律

世界是不确定的，这是我们惟一确定知道的事情。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如何有所作为？如何保有理智？

Siddhartha Mukherjee是癌症医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几年前出的《万病之王：癌症史》为他获得了普利策奖。面对医学世界的不确定性，他总结出三定律。

第一，强假设（prior）胜过弱检测。

Mukherjee执业之初有个病人，体重持续下降，但无论作什么检查都查不出什么病，直到有一天作者下班时偶尔看见他与一位病友聊天，这人已知是吸毒者，Mukherjee灵光一现去查自己病人的AIDS，结果阳性。

第二，常态告诉我们规矩，异常（outlier）则告诉我们法则。

托勒密行星运行理论解释一切都很好，惟独火星是个异类。开普勒不放过这个异类，于是发现行星运行的轨迹是椭圆而不是托勒密模型中的圆。科学进了一步。

医学有同样的故事。药物研发进到临床试验阶段，是著名的死亡之谷，绝大多数药物会在这里失败。研究者和药厂一般只关注为什么会失败，极少关注为什么试验药物有时在个别人身上见效，直到有人较真研究了一例抗癌药物临床试验的失败，发现在绝大多数失败的病例之外，药物在一个被试者身上明显见效，而在其身上发生了一个罕见的基因突变。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抗癌药见效与否，见效程度，与被试者有无这个基因突变高度相关。这个发现有可能带来药物临床试验的革命：先作基因测试，根据基因特性选择被试者。

第三，每个完美的实验都有个完美的偏见（bias）。

双盲受控实验是医学进入现代科学的最重要标志，体现了医学克除偏见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但即便如此，偏见并未绝迹。第一，愿意成为被试者本身，已然是一种选择；第二，被试者的选择过程仍然难以摆脱偏差，比如女性被试者代表不足；第三，双盲受控测试的结论对被试群体有效，但一般化则未见得。比如，卡介苗在双盲受控试验中显示有预防肺结核，但实际使用中，其有效程度自北向南呈线性下降。原因至今不明。

假设、异类、偏见统治下的医疗世界，与我身处其中的新闻世界相似，你的世界想必也一样。好在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惟一有所庆幸的地方是绝不会忽视异数。这几乎是新闻报道惟一关心的东西：我们不关心正常值。

悲剧选择

怎么分配不幸，体现一个社会的良心：泰坦尼克号撞冰山，谁先下船？计划生育，如何分配生育指标？器官移植，谁优先获得器官？大病保险，哪些病能进名单？

《悲剧选择》（Tragic Choices），耶鲁大学法学院前院长Guido Calabresi的名著。Calabresi与科斯、波斯纳一起并列为法经济学的创始人，本书副题是“社会在分配悲剧性稀缺资源时面临的选择”，专讲社会怎么分配悲剧：怎么确定悲剧总量，以什么方式分配给谁。

社会分配悲剧有四个单一策略：市场、政府、摇号、惯例，但没有哪个能长期维持分配的稳定性。

市场化分配是价高者得，将已有的财富不平等延展到当下悲剧分配的不平等，并且将人们认为不可定价的东西比如生命也贴上价签。没有一个社会能允许用市场化分配一切。

政治分配的好处是较能反映民意，如果政治背后的力量对比产生自选票的话；但这也催生混乱成为现代政治的常态：如果政府直接出面分配悲剧，那就成为社会价值观冲突的目标；民意如潮汐，总在分配谁去承受悲剧的政府无法保持稳定。

抽签把一切交给运气，看上去是绝对平等，但抹杀了被社会珍视的另外一些平等观：为什么不先救孩子？为什么不把机会让给那些有巨大贡献的人？而且，抽签撕下了面纱，让悲剧之无法避免赤裸裸地摆到社会面前。社会其实不能承受这种真相。

所以，社会也用惯例、习俗、文化来掩盖对悲剧的分配，比如印度留存至今的种姓制度。可是，这种表面上无分配的分配有其代价：社会假装习以为常，丧失诚实。

怎么办？

第一个办法是看不见的悲剧就假装不存在。夫子选择远庖厨，因为戒不了荤腥，又不愿离杀戮太近。社会要有道德自信，就得将悲剧分配伪装成并非出自分配。稀缺永恒，每个社会都在做六个杯子五个盖的腾挪，如果能玩就玩下去，如果玩不下去，社会就重置。

第二个办法是周期。社会无法在冲突的价值观中作出取舍，所以在特定时段某个价值观占上风，直到它聚集的负能量过多，被另一个价值观所取代。风水轮流转，这是社会选择的跨时多元化策略。

“我们都想活下来，但做不到；我们希望人人平等，但不是；我们希望苦难终结，但它不会。”

每个新闻工作者都该读这本书。

补互联网公民课

老板让你做狼，不然就代表狼群灭了你。这已经流传好长时间——史玉柱不过是应和了李彦宏几年前致全体百度员工信的号召而已。坦率地说，当时看到李彦宏自觉百度狼性不足，我是崩溃的。但凡生活信息，尤其医疗，前三页搜索结果都导向骗子。百度还缺什么狼性？

借用“狼性”这个词，以错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想象一种穷凶极恶的境界，以为弱肉强食是惟一的戏。这既误解了自然也误解了社会。狼并没有这种“狼性”。作为生态系统的一员、食物链的一环，狼有夺有予。只有“狼性”的社会更不可能，因为这种社会里连“狼”都活不下来。

高扬想象的“狼性”，对商业完全无知。商业是正和游戏，分工和交易创造价值，是社会福祉进步的最终来源。分工交易编织价值网络，厂商、客户、竞争者、政府、公众既合作又竞争，在创造价值做大蛋糕的环节合作，在分配价值切蛋糕的时候竞争，而合作是竞争的前提，创造是分配的源泉。大家都做恶狼，下场是一起饿死。

分工合作创造价值，是商业的“原善”，将其扭曲为原罪，无知，浅陋，恶。

互联网公司对社会冲击全面彻底，超过有公司以来的任何时候。对各种使用场景的发掘和控制，使互联网公司系统改造社会，洞穿了对人们生活的层层传统保护。跟身份有关的一切信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敏感，又越来越被滥用。

这一切都发生在五到十年之间。支付宝、Facebook不过十年时间，微信刚刚过完五周岁生日。互联网公司失败者无数，但一旦成功，成功就快得大得令人头晕目眩，却必须完成从颠覆者到守护者的角色转换。它们很难走出颠覆者的心态，却必须担起守护者的责任。

公司要追求利润，同时是社会组织；员工和管理者要在大公司的阶梯上追求职业进步，同时是社会人。公司在社会里生存发展，个人在公司里获得工作带来的回报和成就感，实现抱负。互联网公司不仅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分工合作生产方式，还有更多的使命：折射、凝聚、扩展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互联网公民这一课需要补上，从思考它开始：在再造经济微观过程和结构的同时，要与社会价值观兼容，也有责任帮助员工获得比单纯受薪更完整丰富的人生。

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答案并未定型，仍然在焦虑、纷扰和忙乱中酝酿。正因如此，中国的互联网大公司比前辈大公司更大的责任参与塑造它。这责任当然并不唯一地属于它们，但它们往哪个方向努力，确实关乎中国能否有一个良性社会。没有谁愿意承担这样沉重的责任，但没有办法，力量越大，责任越大。腾讯、阿里巴巴、百度、360、小米，还有无数今天的独角兽明天的BAT，责无旁贷，没有借口。

时间多元化

卡内基说，作为富人死去是可耻的。富人的烦恼对应的是人生第二大悲剧：钱没花完，人死了。凡人则面临人生第一大悲剧：钱花完了，人还没死。

如果你20岁开始工作，60岁退休，而人均寿命是75岁，这意味着40年工作带来的收入流，要支撑75年的生活开支，时间长出将近1倍——不要以为前20年由父母养育你占了便宜，你得养育自己的儿女，代际转移支付。

人们爱谈财务自由，但对于财务自由没有公认的解释。有人说财务自由就是随时可以说不干了，就是如果你有这笔钱那么不想干了马上就走人。许多人认同这标准，但它过于感性。《生命周期投资法》这本书提出一个更合理的标尺：财务自由的底线，就是退休后仍能维持退休前的生活。

但是，人的一生，收入流是不平均的，初期少，后期多。如果按通常的股债固定比例投资，则投资资金过度集中于中后期，而那时就已经太晚了，大有可能无法筹齐退休后维持同样生活所需的资金。更何况，人均预期寿命还在攀升。更何况，还有通胀。怎么办？

《生命周期投资法》这本书里提出一个有争议同时激发思考的建议。两位作者Ian Ayres、Barry Nalebuff均来自耶鲁大学。他们主张，一生的投资，必须在组合多元化之上更进一步，追求时间多元化。

将你的一生收入流贴现到现在，乘以投资组合中买股票的比例——这个由你的风险偏好决定——就是你现在应该用来买股票的资金额。刚工作的年轻人因为收入偏低，总是达不到这个数字，所以要加杠杆。杠杆当然有风险，但在时间多元化抵销后，在跨度长度40年的投资期中，仍然能获得相对低风险下的相对高收益。当然，这里说的都是投资于指数。

为了将投资熨平，他们建议年轻人一开始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加杠杆，比如，可投资资产的全部，再加1倍杠杆，然后随着年龄增长逐步减杠杆——鼓励年轻人加杠杆，这就是争议的来源。

按此逻辑，大概齐能算出过你想要的生活需要多少钱，大概齐告诉你需要什么样的收益率，大概齐告诉你需要什么办法算出你的股债组合比例，大概齐告诉你一生中杠杆增减的逻辑。它提供了一个思维框架，至于各种参数，只有你自己能填，它们来自你的人生。

当然，它滋生无数新的问题：杠杆会不会在短期中就已经把你消灭？你能不能用足够便宜的价格获得杠杆？将你一生的现金流贴现到现在，这事理论上可以想象实际上无法做到。等等，等等。

人生难题不会减少，只是换了角度。

黑帮解密指南

黑社会之所以是黑社会，就因为它传递信息的方式与正常社会不同：既要传递信息，又要信息保密。本书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框架用于分析黑社会的信息传递、身份识别、信任机制、可信度。作者是意大利社会学家，长期研究黑帮现象。

黑帮怎样使用暴力？黑帮是使用暴力的生意组织，过度使用暴力对生意不利，贵，风险大，引发社会不安和政府压制；但黑帮又必须使用暴力，否则叫啥黑帮。成功的黑帮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但又会尽可能避免全面开战，因为暴力本身并无价值，价值在于它用极端方式传递出的信号：别碰我的生意。

ds 黑帮讲义气吗？黑帮是最没有义气的社会组织。越是短期博弈，义气越是没有价值。黑帮随时可能被政府瓦解，总是围绕着关键人物存在，而他随时可能坐牢。对黑帮人士来说，敢于使用暴力的名声、生意一旦达成就会遵守的名声，都有价值，惟独忠诚无价值。

怎样有效辨别卧底？加入黑帮，一要交投名状；二是卧底一旦被发现就得死。Gambetta认为投名状加驱逐卧底是更好的办法，也就是说，严进宽出。严进严出，则卧底无法退出，只能拼到底；严进宽出，则卧底会倾向于主动退出；严进足以识别卧底的警察：请问，哪个警察会提人头来加入黑帮呢？

周期难驯

周期的杀伤力这么强，我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周期性波动就大，这固然是风险，但正如人们所说：人人皆知的就不再是风险，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公司管理不好周期，水来就都浮起水退就都裸奔有些干脆就垮了呢？

周期管理很难吗？

不难，也难。不难，是因为周期像山岳一样古老，不新鲜不神秘，盛衰循环贞下起元，哪怕不知道拐点在哪里，贴秋膘总会吧。不作预测，作准备，奔跑时不要跑脱力，修整时别放羊；逆势拳头能缩回来，顺势则能打出去。

道理如此简单，做起来也只需要想得长一点点，可为什么能做到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就做不到呢？

难，是因为激励扭曲。“只要音乐还在放，抢凳子游戏就得玩下去”，当时的花旗集团CEO普林斯这样解释次贷危机成因。别人往前跑，你就得一起跑，哪怕跑到最后结果是一起掉下悬崖。因为不干这蠢事，不参加2007年之前最后两年的次贷游戏，你的利润增长就赶不上同行，股价就上不去，然后CEO位子就保不住，还没等次贷发生，你先出局。

更何况，没人相信大家一起掉下去这事会发生。现代央行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危机中汲取的最重要教训，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发生。所以，一起玩命跑向悬崖，非常理性。不跑，现在就掉队，跑，指不定谁掉下去，未必是我。

多么理性。

正是因为这是理性选择，所以周期行业巨头们哪怕其生意就是靠管理周期过活，事实上也很难管理好周期；金融更是周期叠加杠杆的高风险行业，而金融机构们事实上把周期管理的责任交给了央行——格林斯潘put、央妈，指的是同一件事。

扭曲激励总会导致意外结果，而且往往与目标相反，在现代央行出现之后，金融危机的次数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

同样逻辑适用于政府官员。短期绩效最重要，长期能否持续不重要。长期中，凯恩斯说，“我们都死了”。对于官员和CEO们来说，长期？那是下一任的麻烦。

无论中外，现代社会的政经体系普遍地转向委托-代理结构，再伴之以普遍的绩效考核短期化，使得周期管理变得越来越难。这是已持续数十年未来也看不到终点的新常态。

一位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经理对我说，“最远只看未来三个月，然后滚动更新判断。”在短看短，他是对的。

通胀对僵尸有利

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关于通胀的由来其说纷纭，其实不必如此。假如信息透明，人们绝对理性且智力无限的话，通胀这件事理解起来很简单。

每当央行要印钞，比如给货币供应量增加个10%，那从农民到工人到教授到公务员，所有人自动把货物和劳务的价格往上刷10%，整个社会平移了一下而已，主体部分没有收益也没有损失。

谁受损呢？

持有净现金的人。谁拿着钞票谁吃亏，拿得越多越吃亏，储蓄越多越吃亏。

谁受益呢？

持有净的负现金的人，也就是欠钱的人。欠得越多越占便宜，负债率越高，越僵尸化，越占便宜。

所以，哪怕是在货币政策最透明、人民最聪明的想像情境中，通胀也会引发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从持有现金的人流向欠钱的人，从黄世仁流向杨白劳。

所以，哪怕房价已经如此之高，此时此刻，人们还是在买房，因为与其别人欠我钱，不如我欠别人钱。通胀预期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现实中，因为信息不尽透明，人不太理性且智力有限，所以通胀还生出了丰富得多的内涵。

当局印钞，那么多印的货币是怎么投放出去的？绝不会是普惠的，因为这种机制从来没有存在过，否则就不会有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做学者时提出来的直升机撒钱建议了。不普惠，那就有偏向。各国机制不同，详情难以尽表，但央行要大量向外发钱的时候，必定推出各种英文缩写机制，外人看都看不懂，但只要看政府货币当局印钞要解决的困难是什么，不难知道大体谁会受益。2008年以来美欧的情况是金融机构受益，宰了雷曼一个，幸福了大家。中国当前要解决的大问题是“僵尸企业”，想想看会发生什么。

表面上，印钞与通胀并不总会同步发生，现在欧洲日本央行拼命印钞却还是难以走出通缩。央行大力将钱推出大门，奈何经济不振，银行惜贷，企业收缩债务，信用由扩张转向收缩。然而，即使如此，财富再分配也已发生，只是尚未显现而已。

中国又不一样。刚兑未破，僵尸不死，软约束机制硬硬地还在，无数只吃不拉的神兽，使得银行信用逆周期迅猛扩张从来不是难事，倘若加之以印钞，两者合力释放出的能量是难以估量的：在宏观层面为未来埋下更大的问题；在财富分配上造就更大的不公平。

疫苗的四种悲剧

疫苗不是仙丹，关于疫苗，至少有四种悲剧。

第一种，接种正常疫苗，有个别孩子被疫苗伤害。

第二种，不接种疫苗，孩子被病毒伤害。

第三种，接种假/劣/过期/失效疫苗，孩子被疫苗伤害。

第四种，接种假/劣/过期/失效疫苗，无效，孩子被病毒伤害。

疫苗是重大医学成就，与细菌学说一起，并列为百年来人类摆脱夭折命运的最大功臣。打疫苗的实质是用减弱活性的病毒来激活孩子的免疫系统，但人各不同，对于病毒的反应也自不同，绝大多数孩子获得了免疫力，但分布在两侧尾部末端的极少数孩子，则付出了代价。

这是悲剧。

直到今天，我们还只能根据一些直观标准，来判断孩子是否适接种特定疫苗，但精准接种完全避免悲剧，仍然做不到。那些不幸身处尾部末端的孩子，我们只知道总会有，但也只是事后才知道是谁在那里。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由基因理论和基因测序技术武装起来，也只是站在个性化治疗的门槛上，能看见门内的一点影子，更何况公共卫生防疫。

人生各种悲剧，我们能够选择逃离某些悲剧，已属有幸；但仍有一些悲剧，只能去承受。

这是道理，理不容情，但现实比这更残酷。

山东疫苗案发之后，将来面对那些接种疫苗后身体伤损的孩子，谁还敢说，这些孩子运气不好，身体条件不宜打疫苗，但不是谁的错，只是老天爷不长眼？谁还敢说，孩子们一定不是打了不该打的疫苗遭遇了人祸？

不敢说。因为从山东疫苗案看，保证疫苗质量的链条已经掉了。怎么掉的，掉了多少，我们既不知情，也失去了信任。

关于疫苗的四种悲剧中，现代医学使今天孩子及其父母有了在难以全部避免的前两种悲剧中取其轻的机会，而人祸使孩子无从选择地陷入后两种悲剧的命运。四种悲剧并不相互独立。我们越恐惧于后两种悲剧，就越会在前两种悲剧间作出错误的选择。

最猛是人祸。厘清人祸，医学才有机会。

冻结中的日本

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我在大阪街头吃了碗拉面，折成人民币正好是50块钱。第一个感想，是北上广一碗好点的面条也要这个价；第二个感想则把自己也吓了一跳：以人民币计价的话，一碗拉面的价格20年来不仅没涨，还跌了。我第一次去日本正好是20年前，也是在街头吃了碗拉面，其余都忘了，当时心里把一碗拉面的价格折成人民币，大约60来块钱，觉得好贵。

物是人非，固然是因为20年来中国经济、中国人的收入，还有人民币汇率天翻地覆，也是因为这20年日本物价几乎被冻结了。日本泡沫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初破裂以后，说法从“失去10年”慢慢地变成了“失去20年”。“失去”云云，见仁见智，但物价不涨且时常受困于通缩却是个事实。到今天，量化宽松多年犹且不行，还得祭出负利率奇招，求通胀而不得。

二

被冻结的不只是物价。穿行在奥之院墓道中，我觉得时间在日本也冻结了。

奥之院在奈良以西的高野山中，是日本真言宗始祖弘法大师墓地所在。从起点一之桥到终点弘法大师墓，2公里墓道上，笔直、参天、几人才能合抱的古老杉树林掩映20多万个墓石。

这里埋着一部日本战国史：墓石有武田信玄、丰臣秀吉、织田信长、上杉谦信的大名，德川家康的灵台也在不远处。这里也供奉着一部日本当代商业史：几乎所有日本现代大企业在这里都设了企业员工的慰灵碑。在漫长的历史中，敌友情仇化为一抔土，相依归藏，千年不断绝。除了日本，哪里还有这样的地方？

三

近年每次去日本，都强烈感受老人之多和儿童之少。街上见到儿童，细听往往却说着普通话，原来是中国游客。购物中心里的儿童用品部分所占面积，远不能与中国相比。

日本人口老化，人口减少，在冻结的物价和冻结的时间中，惟有年轻不可冻结。

做好自己的事，让索罗斯说去吧

2008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早已退休重出江湖的索罗斯说，美国次贷危机将结束60年来的超级繁荣。

历次危机本质上都是信贷扩张达到无法持续时会出现的现象。每次危机的起点都有一个对于风险与收益的误判，放松信贷意味着资产价格会上升，而这会反过来提供更多的信贷。这一循环总会结束，结束就意味着危机到来。过往历次危机中，金融监管者和货币当局一定会介入，注入流动性，要不就是用其他方式刺激经济，但这次不会取得效果，因为时势变了。“油价在涨、食品价格在涨，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在涨，连人民币现在也涨得快了。”索罗斯当时说，这使得美联储无法不面对通货膨胀。此外，如果美元利率低到一定程度，美元将面对新一轮贬值压力，长期债券收益率将上扬。“我不知道那一天何时到来，但从那一天开始，美联储就再也无能为力。”

索罗斯预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仍然会保持强劲增长，所以不会全球性衰退，但经济实力版图会发生相对变化。

八年过去，这些预言一多半没有变成现实。

在2016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又一次退休的索罗斯又说，2008年式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能重新降临。中国是全球性通缩的三个主要来源之一，另外两个是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和各国竞争性货币贬值。他认为，美联储2015年底加息是个错误。低油价本来是有利因素，相当于对消费者的减税，但是在通缩环境下，消费者决定储蓄，因为未来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产品和服务。他表示，美联储应该纠正错误。

在被问及通缩环境下的投资策略时，索罗斯回答说，“我会做空标普指数，做空原材料生产国的主权债，做空亚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做多美国政府债券。”

不必太拿索罗斯说的话当回事，他的看法始终在变，而且经常错。做好自己的事，让索罗斯说去吧。

人人都能掌握的最强预测法

把一头牛牵上集市的台子，让农夫目测其体重；把一罐糖果放到桌上，让幼儿园小朋友估计有多少颗。谁估得最准？

多玩几次。每次肯定会有一个人估计最准确，只不过每次最准的不会是同一个人。长期中，所有估计的简单平均值胜过所有人的估计简单平均，将所有人掌握的信息和作出的判断聚合起来，比单个人掌握的信息要完整，形成的判断也更准确。这就是所谓群体的智慧。

用聚合来做预测，简单平均只是起点。内特·希弗（Nate Silver）做了个选举预测网站，并不直接做预测，而是做民调的聚合。民调本身是对选民意见的聚合，希弗则是对聚合的聚合：根据每个民调机构准确率的历史记录和动态表现调整权重，最后的结果既包含了对于每个民调机构的绩效评估，又聚合而成一个新预测。

这个预测有多准确？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希弗预测对了奥巴马战胜罗姆尼，这不稀奇。稀奇的是希弗还预测对所有50个州的胜负。

加权平均胜简单均值。这就完了吗？没有。

对加权平均形成的预测结果，再作一次极化，效果更好。所谓极化，就是将预测结果往100%或者0的方向推。举个例子，对美伊达成核协议可能性的预测，如果预测者加权平均后的回答是70%，那就把它上调到比如85%；相反，如果预测值是30%，那就把它下调到15%。

极化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假设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获得了群体的全部信息，他们作预测时一定会更为自信。从群体简单平均值到加权平均的过程，事实上已经聚合了所有人的信息，但没有完全反映出应该有的自信。极化就是要捕捉这个自信。

如果是乐观预测，极化会输出一个更乐观的预测；如果是悲观预测，极化会输出一个更悲观的预测。

根据历史表现动态调整 - 加权平均 - 极化，就是这样简单，但普通人用这个方法，能够战胜专家。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泰特罗克主持的预测公开赛中，2万多名参与者参加，极化算法所向无敌。

极化算法很简单，可适用的范围也很广。触类旁通，只要是存在大量预测者的领域，无论经济、政治、金融还是其他，都可以移植这套算法：根据表现动态调整权重，加权平均，极化，应用的空间极大。

聪明人为什么做傻事

不不不，你猜错了。这篇小文不谈百度卖血友病吧，那是聪明人做坏事，本篇只讲聪明人为什么做傻事。

来做这道题。

0到100，你和你的队友每人任选一个数字，最接近平均数的三分之二的那个人胜出。

先讲结论。

说66的人，是傻子，以为人人都从100想起；说33的人，是普通人，有了点算计，假设大家最常见地随机选数，那么均值是50，而均值的三分之二是33。

可是，你能这么算计，别人自然也能。

说0的人，是好学生。这个游戏中，任何一个貌似合理的策略，得出任何一个答案X，不管X是什么，既然你能想到，那么别人也能想到；而且，别人也能想到你能想到；而且，所有人都能想到所有人都能想到；而且，所有人都能想到所有人都能想到所有人都能想到；

这是一个无限迭代的过程。答案应该是X的三分之二的三分之二.....最后就是：0。

好学生会赢吗？

不一定。

这取决于队友中有多少是傻子，有多少普通人，有多少是好学生。绝大多数人是好学生，好学生才会赢，但现实世界不是这样。

这个迭代推理测试过许多次，发现，有些聪明人，虽然明知“正确”的答案是0，却故意给出20多的答案，因为他们估计队友不聪明，最多也就能迭代两三次。这就是博傻，而这些聪明人有时真的赢了。

可是，这样一个聪明人、好学生、普通人、傻子混杂的系统，是高度不稳定的。在任何时候，只要足够多的参与者灵光一现，就有可能以惊人的迅速收敛到“正确答案”，也就是0。那些博傻的聪明人，哪怕明知前因后果，会跟傻子一样输掉。

在博傻游戏中，聪明人跟傻子没有区别。俗谚有云：如果叫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游起来也像鸭子，那它就是鸭子。博傻入戏太深，你就是傻子。

去产能为何这么难？

去产能，让僵尸企业该死就死，这件事说已有很长时间，做就是乏善可陈。原因很简单，谁愿意做困难的事呢？沿着最小阻力线走，既是市场的也是官员的通常选择。

从地方政府主管官员角度看，对自己有利的情境依次排列如下：

最好是自己不去产能，别人去产能。

其次是大家都不去产能。

再次是大家都去产能。

最差是自己去产能，别人不去产能。

这是一个典型的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所有“理性”的官员都会选择不去产能，因为这总是一个占优策略：不论别人去产能还是不去，自己不去产能的回报总是更高。人同此心，结果就是谁也不会去产能。偶然有人去产能，但很快就会自己把行为调整回来，不然结果就会从游戏中淘汰出局。

打破“囚徒困境”，博弈论的通常建议是反复博弈，长期博弈，在长期中形成声誉，引入激励和惩罚，才能鼓励合作，制约背叛。

但是，官员不同，官员有任期，这决定了他们的视野和行为：挺过这个任期，那就是别人的问题。

短期博弈、“囚徒困境”，决定了去产能是难上加难。打破这个困境，关键在于打破上面的回报顺位，而这必须要有来自外部的强大干预，无论是改变每一个选择的回报，还是使不去产能这件事无法硬撑下去。

可以想象，如果企业-银行真是根据市场条件自行决策、分散决策，产能过剩本不会这样严重。僵尸企业就算还想挺下去，银行也不会持续支持下去，早就倒下出清了。僵尸还在走，银行还在撑，都是因为政府的支持还在，至少对支持的预期还在。

去产能，短期在于改变对政府官员的激励约束，而这有赖于中央的强力干预，把去产能加入官员绩效评估当中，改变官员的认知和预期。长期则在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把“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落到实处，同样，这也得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人人都爱加杠杆

杠杆就是以小博大。自己出一块钱，从别人那里借九块钱，就有十块钱之力，输赢都放大到10倍。有输有赢是风险，放杠杆就是加大风险。杠杆如刀，刀锋所向，砍瓜切菜；但如果刀锋反过来对着自己，那也是砍瓜切菜。

如果不能承受风险，你就不要加杠杆。加了杠杆，市场的波动就是你的主宰。朝着相反方向来个波动，杠杆就能要了命。至于长期看你是对是错，已不再重要，长期来临之前，你已经死掉了。

这不仅是对个人投资者的告诫，对机构亦然。1998年的长期资本公司、2008年的贝尔斯登、雷曼、AIG，哪个不是聪明人济济？杠杆太高，不能容错，活不久。上面说的是市场主体，同样适用于市场系统本身，杠杆过高的市场是不稳定的。

凯恩斯眼中的经济周期是这样的：经济走出低谷，企业和家庭的预期改善，企业增加投资，家庭增加消费，银行增加放贷。杠杆加大，信用扩张，推动经济进一步向上。信用扩张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循环自我强化。如果陶醉过久，信用扩张过度，明斯基时刻终将到来，繁荣结束，减杠杆开始，反向的正反馈席卷过来，无人躲得过。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不是消灭周期，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尽量熨平波动的幅度，管理其冲击。也有许多人不同意凯恩斯主张，认为经济周期周而复始，出清是必要的痛苦，干预反而积累包袱，推迟问题爆发的时间。

这些是学术之争，现实当然有更多的维度。如果加杠杆的风险与收益并不对称，收益归自己而风险由社会承担，那就连风险约束都没有了，所有人都会抢着加杠杆，赢了我赚，输了你亏，如果中间还连着金融机构，那就简直是一定的。领导你不想让金融机构倒对吧？

这就是道德风险，与当事人的道德没关系，就是激励扭曲。

通过银行理财项目和保险资管计划嵌套，宝能系层层放大杠杆，对万科发动收购，整个保险业为之沸腾，原来这样也行！想象力打开了，视野开阔了，不做白不做，我不做别人也会做。

杠杆的齿轮又开始另一个、也是更大的一个循环。

绑紧安全带吧。

等待破刚兑

朋友论势，说到现在钱不进实体经济。企业对前景悲观，所以不愿意贷款投资；银行对前景悲观，所以放款消极收款积极。正如投资家芒格说，告诉我会死在什么地方，那我不去那个地方，企业和银行也是这个心态，所以实体经济里头，资金是环环抽紧，反向的正反馈：越这样，钱越不愿意进去。

但是，钱又确实很多。经济放缓，政府着急，用各种方法往经济体系里注入资金。源头来的钱很多，却不往实体经济去，只好呆在中间地带，自觉不自觉地，它就变成了热钱。

跟通常所说来自海外的热钱不同，这种热钱是内生的。它对资本项目的冲击有限，对汇率的冲击也有限，但它比海外热钱流动得更快，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也更大。

经济不振，资产市场成为内生热钱的主要池子。蓄水越来越多，而出路有限。

近来都在说资产荒。为什么说荒呢？因为主要的资产大类，要么是已经涨够了，要么是已经涨过了。

先说房子，房改以来已经是近20年的房地产牛市了，房价能涨到天上去吗？现在首要处理的问题是另一个方向：房地产去库存。

股市，呵呵，股市已涨过，也崩过，现在要做的是从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中恢复元气。

债市，过去几个月已经发生了大牛市，也许还能涨，谁知道呢，但容量也已经是有限了。

钱多，资产荒。所以，如果经济不振继续，但凡有个靠谱点的大类资产出现，钱就会海啸一样地扑过去。

谁会成为下一个这样的大类资产呢？

我想了想，对朋友说，热钱的下一个好去处，就是去买不良资产，好像蛇吃掉自己的尾巴，又好像物质遇到了反物质，一石二鸟。

不良资产这个大类投资机会什么时候会被引爆呢？

就是刚性兑付被实质性打破。只有那时，不良资产的规模才上得来，而价格才下得去，也才能承受得起内生热钱狂潮的热情拥抱。

这一天越来越近了。

信心是这样来的

人们常常以为信心是一种心理状态，好像内心深处有个开关，拨到这边，信心就来了；拨到那边，信心就没了。既然如此，那么面对困难的时候，呼吁信心就成了最容易的出路。经济一不振，就呼吁人民要有信心，这一幕中外不断重现，就是出自这种误解。给我点信心，成吗？

要是这么容易，怎么会有经济衰退？

信心有还是没有，不是说拨动一个想象中的心理开关就行。信心不是心理状态，而是预期及根据预期采取的行为。

群雁南飞，在天空中形成一个美妙的“人”字，不是谁指挥而来的，而是在漫长的演化中，每个大雁个体形成了这样一个反应定势：如果有雁先飞则亦飞，且飞在其侧后方，这样体力耗费最小。群雁按这个反应定势多次迭代之后，一个飞行中的雁阵便形成了。

很少有人把雁阵与信心二字联系起来，但两者得来差不多。靠大雁中的领导吆喝，是搞不成雁阵这种东西的。得有一只雁第一个飞起，在前面承受最多的风阻，付出最大的努力，雁群才会跟上；而且雁群也必会跟上，因为第一只飞起的雁，用飞起这个行动，为后续的雁创造了一个阻力最小的选择。飞行中的雁阵，社会群体的信心，形成的机制都是这样的。

你先做那件困难的事，并为此付出代价，其他人才会也就会对你有信心。

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说法，以开放促改革。当然，开放是对的，改革也是对的，所以无论是开放，还是改革，还是以开放促改革，或者是以改革促开放，都是对的。只不过，以开放促改革这句话，隐含改革的内部动力不足要靠外部压力来推。

我觉得，内部摆不平的难事，外界压力也是推不动的。就算勉强推动一时，将来也会事与愿违。迎难而上，逆风而起，不留后路，市场信心将不召即至。

今天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追寻现代阿拉伯

“伊斯兰国”（IS）的末日临近了。

自从有联合国以来，同时以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美、俄、中、英、法为敌的准政府组织，还没有存在过，“伊斯兰国”是第一个。再往前，即使是在还没有联合国的年代，敢于对所有强国同时宣战的朝廷，也只有慈禧太后治下的满清王朝，十年后便亡了。

消灭“伊斯兰国”远用不了十年。美、俄、英、法均已在轰炸“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宣布处死中国人质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坚决打击一切挑战文明底线的暴恐犯罪。中国如果派出军机参与这场联合轰炸，将不再不可想象。如果五大常任理事国联手轰炸，战场将何等壮观！

五大常任理事国制度、文化、利益均不同，却都成为“伊斯兰国”的攻击目标，只能说明它残暴至极，突破底线，已成人类公敌，剩下的日子已经可数了。

不过，这片土地滋生出以如此极端的暴力反对现代文明的组织，有着更长的因果。

一百年前，奥斯曼土耳其瓦解，阿拉伯世界应对西力东渐，现代化是首要主题。君主制、纳赛尔主义、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运动百舸争流。采用新式武器和训练的军人，最终成为阿拉伯世俗现代化的最主要推动力量，却在随后的数十年里大多演变成以强人为领袖、以军队和秘密警察为支柱的专制政权。在叙利亚和战前的伊拉克，世俗的专制政权还走向世袭的专制政权。公民社会组织孱弱不堪，一击即溃。

世俗现代化失败，而社会没有稳定器，是回归传统教法之治“返祖”的根本原因。各种主义和道路之争百年来走在暴力加剧的螺旋里，恶与恶相互激发，最暴力者攀到上面。

在《追寻现代中国》的序言中，史景迁说，“现代”指的是一个国家既完整又开放，对自己有透彻了解，同时愿意与他人平等地竞争新的市场、技术和观念。1600年就有了这样的现代国家，但到他这本书出版之时的1990年，还有许多地方没有现代国家。

“伊斯兰国”易灭，阿拉伯现代化的路还长。

为何保护新闻作品权利？

对新致力维权，常有人反问：新闻作品有什么侵权问题？难道事实只许你说不许其他人说？

再普及一次常识：是的，事实属于所有人，不属于任何人；但是，关于事实的特定表达，也就是新闻报道作品，与一幅画、一本书、一部影视作品一样，是智慧创造。每个人都可以报道事实，同样地，每个人对事实的特定报道方式都需要保护。

新闻报道是智慧创造。不然，凭什么每次本刊截稿前记者写得那么痛苦而编辑催稿那么绝望？截稿期的英文是deadline，死线，折射报道写作之难。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一位记者，代表作是一系列非虚构作品。你好意思说，因为她写的是事实，就可以随便侵她的权？

保护新闻作品的权利，与保护书、画、影视作品的权利，出自同一个逻辑：你希望社会提供什么，就要保护什么免于随意被偷的风险。否则，谁会这么傻呢？

都是偷，侵权和抄袭这两种偷法，许多人在区分上是糊涂的。

侵权是未经许可使用了别人的智慧创造，偷走了属于作者的权利。抄袭则是你把别人的创造装作是自己的，至于被抄袭的对象是谁，抄袭的部分占抄袭者全文的比例多少，意图是否良善，多少人围观支持，根本不重要。

抄袭与侵权可以有三种关系。

第一种，两者同时发生，在中国尤其常见。把别人的作品偷过来，把署名换成自己。这种事太多。

第二种，只侵权。未经授权，把别人作品偷过来，留着原署名。这也许不是抄袭，但它偷走了属于作者的其他权利。

第三种，抄袭几乎总是伴随着侵权，但也有些时候，抄袭者把比如一段表述、一句格言据为己有，窃名。

在正常社会里，对侵权，报之以维权，法律说话；对抄袭，报之以声誉扫地。早年抄袭，多年以后被发现，一样能毁掉一位学者的学术生涯。可惜，中国不是这样，抄袭侵权气壮如牛，维权举步维艰，法律纠错乏力，道德评价错位，基本是丛林社会。侵权是一门可持续的生意，而原创变成一种难以持续的努力。多么讽刺！

静等临界点

去年此时，股市涨势已成而疯狂未至，我坐镇财新峰会的嘉宾休息室，看嘉宾们来往，我一一问道，所得千言万语，凝聚成十二个字：“当下无脑看多，将来一地鸡毛”。

一年过去，股市有无脑的了，也鸡毛了。聚合精英智慧这件事，看来靠谱。

今年此时，财新峰会再临，我坐镇嘉宾室依旧，换了组问题。

——会不会改革？

几乎没有争议，有一致共识：实质性的重大改革一定会实施，只是时间问题。

——改革有没有用？

这个也几乎没有争议，只要是坚决实施实质性重大改革，一定会有用。中国人仍然那么勤劳，仍然那么迫切想要致富，政府仍然有那么多改革好牌可打，打出来肯定可以引爆新一轮改革红利。信心比黄金更珍贵，但市场从来不缺信心，缺的只是使市场信心得以凝聚所必需的不可撤回的坚决改革措施。

这两点判断，是中国人与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前景产生重大分歧的关键所在。当前国际上多有对中国经济前景非常悲观的看法，多是基于线性思维；国人则更了解中国改革的周期性逻辑。阴阳相生，既济未济，旧力死透则新力自生。这些是很玄，可也是中国改革走过的真实历程。

——什么时候改革？

这一点分歧最大。有人说看数据，最重要的是看就业市场会不会出现巨大压力，这个现在还没有发生；有人说看时点，比如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就会是一个关键时点；有人说看政策拐点，比如实质性打破各种债务的刚性兑付，当然，这以防止出现债务危机为前提。

这些分歧不是原则性的，只是指标不同，并不针锋相对，彼此仍有兼容之处，存在都对的可能性。改革力度与经济困难程度从来成正比，从底部开始的改革最有爆发力。

让我们静等临界点。

一致性没那么重要

“二战”结束，逻辑学大家哥德尔申请加入美国籍，准备面试。以哥德尔做人之认真，洞察力之深刻，立即发现了美国宪法自相矛盾之处。朋友们如爱因斯坦恳求他，不就是个形式吗？混过去就算了吧。

然而，一个连爱因斯坦都有资格来教做人的人，是绝不会做人的。

面试开始了。

面试官：“你原来是哪国人？”

哥德尔：“奥地利。本来也是民主国家，后来就变成纳粹国家了。”

面试官：“这种事在我们美国绝不会发生。”

哥德尔：“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来证明给你看。”

然后哥德尔就开始列式子。

然后面试官机智地让哥德尔在这里就直接过了，要不然美国宪法就完蛋了。哥德尔是什么人？他提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不完全定理，证明哪怕是一个在普通人眼中相当简单的算术系统，如果是一致的，那么必定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如果凡是推导出来的算术命题都是真的，那么有些算术命题是无法证明的。

其实，哥德尔定理植根于今天已广为人知的说谎者悖论：“这句话是谎言”。请问这句话是实话还是谎言？显然，你说它是实话它就是谎言，你说它是谎言它就是实话。哥德尔的天才，在于为这个悖论找到数学表达，从而终结了为数学大厦奠定坚不可摧基础的尝试。

从哥德尔不完全定理生发出的哲学解释很多，我最喜欢的一种是一致性的重要性被人们过度高估了。《伟大的盖茨比》作者菲茨杰拉德有一句名言，证明伟大作家的直觉与伟大数学家的发现，能通达同样的高度：“同时葆有全然相反的两种观念，还能正常行事，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

哥德尔入籍50多年后，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布什与戈尔不相上下，取决于佛罗里达州一个县几百张选票的计票结果。要不要计票到底？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美国宪法的bug浮出水面：公民投票还是法官断案，哪个才是最后的依据？宪法没讲。

戈尔没有挑战到底，选择了认输。

怎样才能不挨宰？

你是游客，身处久负盛名的异乡景点，眼前是熙熙攘攘的集市，想买点纪念品，但不想被宰：钱没了，心情还不好。

怎么个买法最好？

这种情形，数学家有个经典办法。你总是要先逛再买，但又不想花太多时间，比如准备最多逛十家店，那么，你前三家店逛过去，记下最划算的那个，然后从第四家起，一旦店家给出更好的交易条件，立即接受，换成公式表达是 n/e （ n 为你准备逛的店家数量， e 为自然常数）。数学家保证，这样你有40%的机会拿到最好的交易条件，优于其他策略。证明不赘。

但是，照着数学家的指示一路逛过去，会发现完全不靠谱：所有店铺都用同样的价格卖同样的纪念品。你接受第一个交易与接受最后一个交易，完全一样。店家团结如一人，一定要宰你一笔。这一幕，换成月前青岛的海鲜档，也成立。

为什么店家彼此不竞争？市场失灵了吗？

市场没失灵，它只是整合了各方在信息分布中的不同地位。

游客时间宝贵，其中用于挑选纪念品的时间有限，又不了解“公允”价格，而寻找公允价格要付出时间，往往并不合算。

商家们对此门清，所以偶尔遇到游客侃价，均理性地选择不让步。让步有何好处？做成一单交易并不能带来更多交易。当前买家只买这一次，潜在买家又无从得知这里可以侃价。何必因此得罪其他店家？！有形无形的价格卡特尔就此形成，固化，变成游客和消费者的陷阱。也因此，诺奖得主希勒和阿克洛夫在新书《钓傻瓜》里说，市场经济达到的均衡可没保证过一定是“正常的”，操纵与扭曲往往也在其中。

游客只能挨宰吗？

不一定。如果游客寻价成本大幅度降低，那么愿意侃价的店家就会从无到有，不需政府限价，店家价格卡特尔自然消融。这是鸡生蛋蛋生鸡，而关键在于信息。正如John Mcmillan在名著《重新发明巴扎》一书中所说，给信息自由，这是良性市场得以出现和延续的关键。

国家的面子

人们常以为，在国际事务中，与沉重的国家利益相对，面子不值一提，要面子是政府不成熟的标志。国家利益至上，为此丢点面子有什么不可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那才是正确选择。

听起来是很有道理，那为什么国际事务中国家面子事实上如此重要？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生涯主要在兰德公司度过，用博弈论设计美国针对苏联的“冷战”策略。在《武器和影响力》一书中，他专章讲到了国家的面子。

国家要面子，不是因为领导人虚荣。因为虚荣而不理性地冒风险或者做不体面的事比如恃强凌弱，不是国家的面子。

谢林说，国家的面子有着厚重的内涵，也就是其他国家及其领导人对于这个国家将会如何行事的预期。这与国家的“体面”“地位”甚至“荣誉”无关，只与国家采取行动的声名有关。面子是极少数值得为之打仗的事情之一。是的，单独地看，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重要到不惜为之一战，特别是一步一步地分解来看的时候，但为保卫这些东西，或者冒很大风险去保卫这些东西，证明一个国家的承诺是可信的；其他国家因此相信，在将来涉及其他同样重要的东西时，这个国家也会坚决行动。

所谓“面子”，就是一个国家所做的关键承诺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一国采取行动的声名，是其他国家对此国行为的预期。

谢林以朝鲜战争为例：美军在朝鲜战死3万人，不是为南朝鲜人去救南朝鲜，而是为保全美国和联合国的面子。苏联对于美国在必要时会采取坚决行动的预期，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最重要战略资产。

当然，维护其他国家对于本国行动的预期，兹事体大，不能放到所有场合。特别是，不要把国家的面子与一件不值当的事情联系起来。面子什么时候最贵？就是丢面子的时候。同样地，如果与他人起争端，要帮助对方把面子与争端切割开来——如果我们让不了步，那就不要把对方逼得无路可走。

至于在领导人互访之中获冷遇还是礼遇，对这种面子之有无，真正的政治家一笑而过。

胜利大逃亡

1850年，英国一名15岁少年平均预期还能活多久？答案是：与刚出生婴儿的平均预期寿命一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婴幼儿夭折率太高，哪怕是在当时世界的最先进国。今天，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发展中国家的婴幼儿夭折率大幅降低，平均预期寿命较百年前有了30岁左右的增长。悲惨世界仍无处不在，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已摆脱“短暂、肮脏、残酷”的生活，活得更长，拥有更多的财富。

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ngus Deaton的新书《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就是讲人类从饥饿、匮乏和疾病胜利大逃亡的过程。Deaton说，从这个角度看，现今好于历史上任何时候。

不过，大逃亡并非线性进步的故事，也是不平等和进步交织的恩怨史：无论在一国或全球，财富和健康的分布都不平等。它取决于相对偶然的突破：如果未发现细菌理论，人类或还在平均预期寿命50岁以下徘徊。公共政策也极为重要：1914-1918年的英法德，1959-1961年的中国，预期寿命都突然出现了大幅下跌。

The Great Escape得名于同名电影，电影讲“二战”中盟军战俘从德军战俘营逃亡的故事。Deaton说，取此书名，一是忽略实际结果，重在抗争的意义；二是警醒，胜利大逃亡并不总会发生。

经济是怎样运行的？

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三个经济学家有五个说法，但其实不必这么复杂，赚了几十亿美元之后，著名对冲基金管理人、桥水资本创始人Ray Dalio不仅把答案写成文章公开散发，还把一个制作精良的30分钟视频放到YouTube上。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公之于众。

在他看来，经济运行有如一架简单的机器。

——经济是由无数个买卖构成的。卖的是货或者服务，用钱或者信用来买。卖方代表供给，供给相对稳定，毕竟要造东西出来不是那么容易。买方代表需求，需求波动相对大，因为钱和信用这东西，在当今，创造出来比较容易。所以，经济周期的主要驱动力是需求变化。

——买货用钱结算，如果用的是信用卡，那不是结算，只是承诺会结算，是信用，同理可推到债券、京东白条、票据，等等。钱与信用两者相关但不是一回事。美国社会总信用是钱的15倍左右。钱的扩张取决于央行印钱的节奏。信用的扩张取决于整个社会中卖方接受买方延期结算承诺的意愿。乐观的时候，意愿强，信用扩张；悲观的时候，意愿弱，信用收缩。信用收缩，意味着卖方接受信用的意愿减少，兑现已持有信用的意愿增加。极端的信用收缩就是对信用的一场挤提：给我现金，其余免谈！

——短经济周期中，央行通过利率影响信用扩张与收缩；长经济周期中，当杠杆率过高，央行把利率降到零也无法驱动整个社会的信用扩张时，信用收缩就不可避免，减杠杆开始。

——减杠杆有四种办法：削减债务，就是债权人承受损失；转移支付，就是有钱的补贴缺钱的；财政紧缩，就是少花钱；债务货币化，就是央行大量印钱。只要问题足够严重，总会走到央行大量印钱这一步。

——大量印钱有三种可能后果。第一种是虽然印了许多钱，但全社会信用还是扩张不起来，毕竟钱跟信用不是一回事。这是通缩型萧条，所谓钱不进实体经济。第二种是央行印了许多钱，人们预期本国货币将贬值，因此换成其他货币，加剧本币贬值，造成通胀型萧条。前两种Dalio称为丑陋的去杠杆；第三种去杠杆则是美丽的，就是钱也印了，货币适度贬值，竞争力增加，信用收缩转向扩张，经济机器开始新一轮运转。美丽与丑陋，区别在一个度字。

美国2009年以来算是美丽的减杠杆，中国这次减杠杆会怎样？

世界不是平的

隐喻的力量是无穷的，比如世界是平的。

中国加入WTO之后第四年，2005年，《世界是平的》成为世界级畅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是曾三获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他认为，未来的全球商业世界将日益趋平，而动力来自于三：

第一，地缘政治退场。随着柏林墙倒掉、“冷战”结束，全球政治军事对抗结束，带来长久的和平红利。

第二，技术进步使得人们日益共享信息和统一标准，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和协作平台。

第三，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持续扩张，共同遵守约定的规则，创造并共享利益。

弗里德曼预计，全球商业世界朝向统一的竞技场演进，对企业和个人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适应这个趋平的进程。

十年过后，相反的事情却在发生。

其实就在弗里德曼这本书出版时，地缘政治的逻辑已经发生新的咬合。从2004年冬天的乌克兰橙色革命开始，历史的齿轮转过十年，乌克兰这个国家已面目全非，战争重新带回欧洲，人们开始谈论“冷战”重来的可能性。在亚欧大陆的另一侧，中国与美日的竞争使“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从政治学圈子进入大众语汇。

由信息技术支撑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毫无疑问仍在向前，这是今天的亮点，但步伐已有犹疑。信息技术不是单维的，它既可以用来抹平，也可以用来挖坑。

2001年底，中国在多哈加入WTO，开启黄金十年；WTO迎来几十年来最重要的扩张，多边贸易谈判机制的成功达到顶点，却就此裹足不前，一步步走向边缘化。今天，双边的自由贸易谈判、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如TPP、TIPP、RCEP，各行其道，各国分头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贸易朋友圈。从共享的全球贸易谈判平台上渐渐离心，一个个山头渐渐升起。

世界不再是平的了，人们怀疑那个在变得平坦的世界是否存在过。新隐喻适时登场。一位跨国公司CEO这样对我说：“世界什么时候平过？我们一直都呆在各自的山坡上。”

赖斯的担忧

参加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晚宴，最后有人问：“你当前最担忧的地缘政治风险是什么？”

赖斯说：“最担心中东地区国家体系的消逝。”

从赖斯嘴里说出来这担忧，有奇妙的轮回感。中东的命运之轮转到眼下这一刻，始于十余年前的转动，当时她是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9·11”袭击之后美国一系列应激政策的制定者之一。

从现在回溯过去，2001年“9·11”袭击之后，美国发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萨达姆政权，袭取基地组织首脑拉登的性命。但战争的魔盒使基地组织扩散到整个两河流域，并催生更为激进的“伊斯兰国”（IS）。

推翻政权容易，新政权稳固难。多年后，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此时，从北非到西亚，中东地区的各世俗政权在内部冲击下风雨飘摇。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在位领导人或逃或拘或死，其他政权也普受冲击。

美国政策转向消极，本地区世俗政权切换到求生模式，极端势力大张，另外伊朗崛起。中东旧平衡被打破的过程，在后视镜中似能看到环环相扣的链条。阿西莫夫曾描绘过这一链条：数学家谢顿发明“心理史学”，预测超长时段人类社会的演进，因为预测灾难来临，为人类的存续，在宇宙尽头设立了基地，名著《基地》由此得名。

但这样的预测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之中。不说人类社会，即使是决定论统治下的宏观物理世界，只要初始条件有细微差别，输出结果就会天差地别，所谓蝴蝶效应。这正是混沌理论的核心论点：决定论的世界也不可预测，更何况人的世界。

从现在往未来推演，中东地区的国家体系正在消逝，伊拉克、叙利亚在“伊斯兰国”的攻击下，边界名存实亡，政权危如累卵，难民四散逃生。多米诺骨牌会不会相继倒下？上百万难民会给欧洲这个富足社会带来什么？

现实世界中的政策制定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你今天过度自信了吗？

你能长期战胜A股市场吗？

我在新浪微博上做了一个简单调查。我问，A股接下来涨跌不论，你觉得自己能在长期中战胜市场吗？能战胜多少？比较的基准为上证指数涨幅对自己的年化收益率。

调查不算严谨，但结果还是让人震惊。

共有2050人投票，其中，认为自己不会输给A股市场的人有1485人，占到72.4%。

其实，过度自信是人的通病，无论是在哪里，调查哪类能力，都会有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不低于平均水平，不独A股投资者如此。

但A股投资者的过度自信远不止于此。在认为自己不会输给A股市场的人当中，一半认为自己长期能战胜上证指数10个百分点以上。长期战胜一个有代表性的指数10个百分点，巴菲特也不过这水平，而我的这个调查样本中，有744人认为自己做得到，超过三分之一。

这些人当中，更有555人，超过总数四分之一，认为自己能长期战胜上证指数20个百分点以上。他们自认是股神。

要按这些人的自我估计，A股就该处处是股神，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据朋友提供的某券商旗下一营业部的客户收益统计（从2014年6月1日到2015年7月1日）：

资产量500万元以上的，账户总体盈利的只有12个，交易客户数为73户；

资产量100万元到500万元的，账户总体盈利的只有51个，交易客户数为389户；

资产量30万元到100万元的，账户总体盈利的346个，交易客户数为3089户。

同期，上证指数从2039点涨到4053点，上涨几乎1倍，标准牛市。上述营业部客户当中，不要说战胜市场了，盈利的客户仅占总数的11.5%。股神去哪儿了？

极度膨胀的自信，极度悲惨的表现，对比何其强烈。

你今天过度自信了吗？

劣币驱逐良币吗？

劣币驱逐良币，众所周知，已成常识：如果含金量高的金币与含金量少的金币一起流通，那么，人们会窖藏含金量高的金币，只使用含金量少的金币，仿佛后者将前者赶出了市场。

很有道理，不是吗？

不一定。

想想看，你是想用含金量低的钱来买东西，但别人有那么傻吗？

1949年，国民党政府搞币制改革，推行金元券，失败得很惨，结果只是加剧了民众对政府信心的崩溃。作为一种劣币，金元券没有驱逐良币黄金和美元，黄金和美元驱逐了它。

一定要说哪个合理，良币驱逐劣币才是纳什均衡：因为预期到没有傻瓜会接受劣币，所以你的最优策略也是不使用劣币。因为谁用劣币，最后劣币砸在谁的手上。

但是，货币的事情可没这么简单。

实验经济学发现，如果市场此前一直用劣币交易，那么这时引入良币，人们确实会窖藏良币，继续交易劣币。比如说，市场上一一直用纸币（无息）交易，现在引入公债（有息），人们就会把公债藏好，继续用纸币。

劣币到底能否驱逐良币？

没有普适性答案，取决于交易者的信心：如果他们对于交易对手接受劣币有信心，那么劣币就会驱逐良币；如果他们对此没有信心，那么良币会驱逐劣币。

信心从哪里来？

习惯，先例，制度。

实验经济学还发现，如果规定只能使用纸币，那么，即使交易者们明知这纸币有使用年限，到期后就会被禁用，被新纸币替代，他们还是会使用这种纸币，而这种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比想象的要小，并不会因此经济崩溃。

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货币才会导致经济崩溃？

诺奖得主、实验经济学大家Vernon Smith说，如果有人能够随意印钱，然后用印的钱在市场上把其他没有印钱资格的买家挤出去，导致市场丧失发现价格的能力，那么，经济才会崩溃。

掉链子

灾难什么时候、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事后彻查，必然会发现，通向灾难的各个环节全部都掉了链子。美国三里岛核事故之后，调查员发现的就是这个结论。这不是巧合，而是后视镜看问题：灾难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所有环节的链子都掉了，但凡还有一环没掉链子，灾难都有可能得以避免。

天津爆炸事件，政府监管、危险品物流储运、化学品消防专业训练、独立环评、与民居中心隔离，但凡有一个环节不掉链子，后果就不至于如此惨烈。

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大多数时候井井有条，运作有序，自然而然造就社会福利，改进效率。你不必知道任何细节，只在淘宝下单，但自有成千上万彼此不相识的人分工合作，采矿、伐木、加工、物流、零售，最后一支铅笔送上门。有人于是惊呼设计师的伟大英明，或者赞叹市场无形的智慧。

但真相是粗糙的，真实社会哪里这么丝丝入扣，其实处处都在掉链子，掉链子是社会的常态，但当掉链子构成一个闭环，灾难就会发生。理性设计是了不起的，市场自发调节是伟大的，但个人在社会中最可靠的保护，不是指望设计和市场能防止别人不掉链子，而是链子掉得随机，掉得不要有相关性，更不要有系统性。还有，如果掉链子形成闭环这件事还是发生了，最好自己不在里头。

都是掉链子，原因有不同。有些环节掉链子是因为训练不足，对此的最快解决办法是读这本书，《清单革命》，The Checklist Manifesto, 作者Atul Gawande是医生，曾担任过奥巴马医疗改革顾问，耳闻目睹太多因掉链子而起的医疗悲剧，然后发现这悲剧普适于各行各业，于是找到了这条简单明快的对策：列清单，然后有事对清单。这说来简单容易，却被推为近年最重要的思想建议。哥伦布竖蛋，不过如此。掉链子是国际惯例，要学习国际经验，解决自己的问题。

还有些环节掉链子，根本谈不到跟训练有什么关系，人家气壮如牛掉又何妨，自己掉链子，别人付代价。这些人掉链子掉出相关性、系统性，制造闭环的能力超强，聪明的选择，是躲开。

预测的最高境界

专家意见是否靠谱？Philip Tetlock说不。他的《专家的政治判断》早成经典，系统比对事态的发展与专家们事前的预测，得出结论：

专家对未来一年以上的预测，准确率不超过扔飞镖；专家对自己的预测能力总是过于自信；一旦预测错了，专家总是有理。

简直一无是处。

剥完专家的皮，Tetlock近来又出了本书《超级预测》。为什么会用这个标题？难道政治预测这件事终究还是有救的吗？

“情报高级研究项目”（IARPA）组建于2006年，合并了美国国家安全局颠覆性技术办公室、地理情报局全国技术协作组、中情局情报技术创新中心，直属国家情报总监，旨在跨机构为美国情报界提供革命性的新能力。

开个玩笑，情报界只犯两种错，就是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简单说，第一类错误是假阳性（false positive），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判断；第二类错误是假阴性（false negative），拒斥了一个正确的判断。

IARPA想寻找预测的最优边界：在那条线上，减少假阳性类错误的任何努力，必然造成且只造成假阴性错误，决策者只需要选择停在这条线的哪个点上。这就是预测的最高境界。

IARPA找到Tetlock：如果过去的政治预言被证明没什么用，那现在要做的不是放弃预测，而是想办法改进预测。

双方合作，从2011年到2015年，数千人就数百个重大问题持续作出预测，比如欧元区危机，实时预测，实时检验。

结果怎么样？

第一，预测必须是可检验的。你不能检测“欧元完了”这样的说法，只能检测“希腊会不会在今年内退出欧元区”这样的判断。

第二，短期预测是有希望准确的。

第三，参赛者中最优秀的2%，准确率明显高于其他人。

第四，群体预测的平均值，准确率超过单个超级预测者。

第五，基于预测者行为开发的预测算法，预测能力明显优于单个预测者。

诺奖得主的泡沫实验

虽然人们说中国股市仍然是散户市场，预测后市也还会看新开户数及保证金增加数，但现在看这些，更像是屠户看生猪体重够不够出栏。散户从来是市场中的鱼肉，而刀俎越来越多越来越精良。

人人皆知股市风险很大，但风险到底是什么？每个入市炒股的散户都在券商那里做过风险教育的测试题，但恐怕真明白的没几个。

股市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体，既包含零和博弈，又包含正和博弈。所谓零和博弈，是因为股市是交易的集合，而交易本身是零和的，你之所失是对手之所得。所谓正和博弈，是因为长期中，股市参与者加总起来的整体收益，最终取决于上市公司效率提升业绩改善。所有主要股市的主要指数，在长期中看，都是一条向上攀升的线，因此存在所有人都获益的可能。散户惟一能参与的，就是股市的这个正和博弈部分，所有人透过市场赚企业增长的钱。

市场中零和博弈的那部分对散户就是陷阱，不可能与机构拼交易：拼不了技术、拼不了通道，拼不了电脑算法，拼不了计算能力，更拼不了信息优势。当前大幅振荡的市场，是大鳄的天堂、散户的坟场。拼交易已是死路一条，再加上杠杆去拼交易，是嫌死得还不够快吗？

说这些，在说者是苦口婆心，在听者是多管闲事。中国并不缺少投资者风险教育，问题是风险教育本身无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Vernon Smith有经典论文《实验室中的股市泡沫》，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泡沫。所有参与者对于模拟交易的“股票”的内涵价值非常清楚，远远比真实股市中清楚，每轮交易前都有特别提醒，就这样，泡沫还是反复出现。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不出现泡沫呢？略过细节，直接上结论：

第一，股票内在价值的充分信息和风险警示，对于防止泡沫形成基本没有用处；第二，被泡沫咬过，对于防止将来出现泡沫很有用处；第三，距离上一次泡沫的时间越久，新手越多，则泡沫接下来出现的机会越大。标普指数大跌的程度与距离上一次大跌的时间长度之间，相关程度是98%。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故事，相信“这次不同”的人越多，出现泡沫的可能越大，程度越深。

太阳底下无新事。

演化中的世界和世界观

最近读到复旦大学教授唐世平的新书《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书获得了国际研究协会（ISA）年度最佳著作奖，是中国政治学者第一次。唐世平以进化论来解国际关系史，并批判既有的多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石二鸟。

书中援引考古学研究，认为战争不是从来就有，而有其起源，大体在公元前8000年出现。这个时间与农业和定居生活出现相近。此前的狩猎采集时代，人口压力很小而资源相对充裕，几无战争，称为天堂时代。到了农业和定居时代，战争一旦兴起，基于恐惧和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成为群体间争端解决的最主要的最终机制，并重组人类社会，创造国家。人类社会就此无可避免地滑向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也就是群体之间暴力解决惟力是视的时代。

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中心机制，却也埋下了进攻性现实主义自我颠覆的种子。当代新自由主义认为战争减少有三个主要原因：民主化、相互依存和多边机构与规则出现，本书认为均误，战争才是战争减少的理由。征服的结果是国家数量越来越少而规模越大，所以征服越有效，接下来就越失效。自1648年威斯特法里亚公约以来，所有建立霸权的努力全告失败（除了美国），已启动防守性现实主义的潮流，在“二战”结束时已成主流，蔚为壮观。而在“二战”结束以来，接受长期和平共处现实的国家们，在重复博弈中趋向长期合作，并催生多边规则，走向基于规则的国际关系。

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自于并适用于前大国政治时代，防守性现实主义来自于并适用于大国政治时代（1648-1945），新自由主义来自于并适用于“二战”结束以来的时代。国际体系处于永远的演化当中，没有一个单一理论能跨时通吃，而错配理论与时代，轻则殒身，重则亡国。

天堂时代-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防守性现实主义时代-基于规则的时代，唐世平描绘的国际关系演化很有鹰鸽博弈色彩。在当下这个时代，唐世平建议国家间的正确策略是尽量合作，尽量将合作制度化，尽量不用武力解决争端。

历史在永远的演化之中，既无周期也不会重返过去，更不会结束于基于规则的状态之中，下一变是什么？书中没有试图做答。演化无目的无方向充满偶然，下一步不可预测。

唐世平先学分子生物学，后转国际关系，现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本书以进化论来解国际关系史，同时批判既有的多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获得国际关系研究协会（ISA）2014年度最佳著作奖。

本书建构了自己的社会演化范式，主张社会演化是有意识的，群择的，对环境变化应激的，获得性特征是可“遗传”的，选择不再是简单的自然选择而是受自然限制的人择，且最终社会演化没有方向，历史没有目的。

英文荐书-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唐世平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唐世平认为，目前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假设单一理论适用于国际关系数千年来演进现实，缺少时间维度，未经进化论洗礼。他认为，人类的群体间关系几千年来经历了天堂时代-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防守性现实主义时代-基于规则的时代的演化。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自并适用于史前到前大国政治时代，防守性现实主义来自于并适用于大国政治时代（1648-1945），新自由主义来自于并适用于“二战”结束以来的时代。国际体系处于永远的演化中，没有一个单一理论能跨时代通吃，而错配理论与时代，轻则殒身，重则亡国。在当下时代，他建议国家间的正确策略是尽量合作并尽量将合作制度化。

历史永远在演化之中。下一变是什么？唐世平没有试图做答。

贫困是惨剧之源

家家户户都必须出去打工，不然一定会饿死。”近三年前，同事王婧在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采访刚发生的一宗惨剧时，村民这样说。那里是喀斯特地貌，旱地只能来种玉米，碰到灾年，收成还不够一家的口粮。联合国机构曾将这里划为不适宜居住的地区。

父母都走了，孩子怎么办？

孩子的悲剧最打动人心。当时，擦枪岩村五名孩子栖身20公里外的毕节城区垃圾箱，点火取暖，窒息死亡，震动全国（参见本刊2012年第46期“五个少儿的生与死”）；时隔近三年，从七星关区又传来消息：四名5岁到13岁的留守儿童在家农药中毒身亡，疑为自杀。

两宗人间惨剧同出一地，只是村落不同。贫困压力下，全方位崩坏：当下这宗惨剧，母亲早已离家，父亲外出打工而所留电话号码无法拨通，孩子们独自生活近五个月，玉米为生，处于事实上的被遗弃状态。其他亲属或年事过高或亦身陷赤贫，未能尽责；社区帮助几乎不存在，因为发生惨剧的家庭正在经历的散沙化，无非折射整个社区的散沙化；最后，政府的援助未见效果。贫困是惨剧之源。救救孩子，要从减贫入手。

在谈到全世界减贫问题时，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认为，发达国家应大笔增加援助，将全世界贫困人口拔到贫困线以上，而所费并不超过每年的农业补贴。

萨克斯的建议可行与否有很多争论，但肯定不适用于这里。这里本不适合农耕居住，援助不过是把钱扔到山风里。近20年前，我曾在凉山考察，亲眼见过另一些被联合国机构划为不适合居住的山村，山民的贫困与环境的恶劣程度，一般无二。出路早就明了，只有一条：搬迁。

只是往哪里迁？山上没有良田，难道山下会更宽裕？以凉山为例，彝族山民的祖先就住在山下的安宁河谷，那里是凉山的粮仓；他们的祖先，一步步从河谷退到丘陵，从丘陵退到低山，从低山退到高山。当时山下容不下他们，今天如何容下他们？同样的问题，适用于今天。

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全世界最伟大的减贫成就，然而还未脱离贫困的那部分人群，赤贫状态仍令人窒息。如果只是靠种粮食养活自己，山上的方寸之地无用，山下的地也不可能够分，还是只能回到经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就地有梯次地消化人口压力。人是资产不是负债，但要有恰当的催化剂，才能打破这场循环的零和性质。政府责无旁贷。

稳增长

中国经济向来是有多重目标，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还要防风险，也要惠民生。多重目标之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眼下，对于决策者来说，在兼顾多重目标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稳增长，纲举目张，稳增长是实现其他目标的途径。

要防止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决策者为中国经济当下和未来的发展勾勒了一个轨迹：当下，从高速增长稳步回落到中高速增长；将来，稳步进入永续性的中速增长。这可能实现，但挑战很大。著名国际经济学家Barry Eichengreen作过一个实证研究，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从高速增长回落下来的时候，几乎没有过稳步回落到中高速的，几乎都发生过断崖式下跌，无非是有的再反弹回来而有的没有。

中国要防止重复这些经济体出现过的断崖式下跌，为此需要把经济增速回落可能触发的一些重大风险点，预先防范，预案处理。这些风险点，可以表现在特定地区，比如经济下滑暴露得比较严重的东北；可以表现在特定行业，比如一些过剩行业，比如房地产、水泥、钢材等；可以表现在特定主体，比如地方政府负债。

当前，出现了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的呼声和趋势，这是中国现行体制下的宏观政策创新。比如，地方债的置换，置换后的地方债，银行可以作为向央行申请再贷款的抵押品，这一类安排，联接财政部、央行、地方政府、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既可以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又可以化解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风险，还为央行在必要时向银行体系注资搭建了新的通道。类似的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举措，未来

应该还会相机取决。

常态化政策如央行降息降准，势必继续，但这不是量化宽松。过去央行释放基础货币的主要途径是外汇占款，量太大，流动性太大，为了回收部分流动性，以致于还要发央票，发央票还不够，以致于还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池子蓄了很多水。现在外汇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应地，池子里蓄的水就通过降准逐步释放出来。但这是正常范围内的货币政策操作，不是市场想象的那种其他工具都穷尽且无效以后弄出来的量化宽松。央行的政策空间、政策工具还很多。

普京之治

本书用一个六身份框架分析普京的内外政策，即普京集六种身份于一身：国家主义者、俄罗斯历史继承者、幸存者、外来者、自由市场支持者、情报官。初版于2013年底，再版于今年初，增补了克里米亚事件和乌克兰危机后的内容。

作者Fiona Hill是资深俄罗斯专家，曾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俄罗斯的国家情报官。她认为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是普京对西方的转折点，乌克兰危机则是其自然延续。普京的底线是不允许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为此不惜诉诸武力。这是以乌克兰为舞台的俄罗斯在前苏联势力范围内重建影响力的一场威慑性非正规战争。在其他议题上，普京仍会保持私营经济，仍会在一些共同利益上与美欧合作。Hill还认为，普京并不了解西方。欧美乐于在俄看到市场经济、法治、宪政，仅此而已，而普京认为这是颠覆其体制的阴谋则是严重误读。

本书还讲了普京如何应对内部的多民族问题、对外的大国主义问题，对历史的全面和解，对私营经济和寡头的政策等，很有洞见；也清除了一些不正确说法，比如普京使用有安全背景的人但并不完全依赖他们。

作者不认同普京之治，但认为普京兼具战术和战略，其政策有很强的一致性，治国方略早在1999年上台前几天的公开信中详述。普京是什么人，答案早已产生。

言尽于泡沫

资产定价模型发明人之一Jack Treynor说，股市大多数时候能正确定价，不是因为有聪明人发现价格，而是因为市场中人独立地犯定价错误，因其独立，反而合成最为准确的价格。好比玻璃瓶里装满巧克力豆，让一群人分别猜有多少粒，其均值往往最接近于实际值。这是个好寓言：市场中人总是错的，而市场总是对的。但是，市场比这要复杂得多。

定价这件事，市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市场定的价，市场中人含着泪也只能埋单。有人干脆说市场永远是正确的，这并不是说它永远是合理的，只是如果总是你来为错误埋单，说错在市场有何意义？

市场中人在各犯其定价错误时，并不总相互独立。有时，因为共享的前景/故事/逻辑，市场中人互相感染，选择同一个方向下注，错误不再彼此抵销，市场于是不再比市场中人更聪明。泡沫就发生在此时。有人认为泡沫是异常态，有人则反过来认为泡沫是常态，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泡沫是人们这类行为方式在资本市场上用价格来作的表达。人不变，泡沫就在某个地方等着你。

泡沫与经济的关系，可不是“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那么简单。有些泡沫发生在经济向好之时，而预期是越来越好，结果股价跑得太远，马车跑到了马的前面；有些泡沫发生在经济不振之时，只是预期会转好，马车又跑到了马的前面；还有些泡沫，发生在经济不振之时，预期会更加不振，而市场中人惟恐经济转好会刺破泡沫。之所以有此表面的悖谬，是因为这类泡沫维系于对政府的预期：经济越不好，财政/货币/政策会越宽松。《经济不起，牛市不止》，这是出自当下著名策略师的研报。

泡沫就在那里，怎么办？

哪怕明知是泡沫，绝大多数基金经理也会参加。不参加泡沫狂欢阶段的基金经理，在泡沫的破裂来临之前，就已经被投资者抛弃。在狂欢阶段同涨，在破裂阶段同跌，是基金经理理性的职业选择。只有少数人有独立行事的资格，虽然选择不同，有的如索罗斯，清醒地寻找并积极参加泡沫；有的如卡拉曼，坚守价值投资，回避泡沫。

普通人就很惨，进退都有一刀等着。参与泡沫，仅仅从概率上讲，绝大多数就会成为泡沫的养分，被割的韭菜，被屠的羔羊。然而不参与泡沫并不意味着就安全，巨型泡沫破裂的成本必然社会化，全社会付代价。

截至4月27日，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创历史新高，达到1.82万亿元，融资买入额占A股成交比例14.81%。

“机器人的反叛”

为天地立心，为自然立法，从人的角度看，人是宇宙的中心，予一切以意义；但在人体深处，从基因的角度看，人不过是其自我复制的载体。自我复制是基因惟一的“目的”，对人类福祉的“关心”仅限于其中有利于基因复制的那一部分，两者利益并不完全重合。比如，完成繁衍，则人对于基因不再有价值，衰老、死亡接踵而来。人类渴求长生，基因报之以癌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人之为人，就是要脱离对于基因的盲从，超越刍狗的命运。

这些见于心理学家Keith Stanovich所著《机器人的反叛》（The Robot's Rebellion）一书，书名中的机器人不是别人，正是人类自己——人是基因的机器人，这隐喻贯穿全书。

与之并行的还有另一个隐喻：人还是meme的机器人。人不仅是基因复制的载体，还是meme传播的宿主。人所要挣脱的，还有对meme的盲从。

meme，一译作模因，被定义为文化基因，也即观念、符号、行为的单位，经由文字、话语、动作、仪式或任何其他可模仿的方式传播。与基因一样，meme自我复制、变异，接受环境选择。从服饰的流行，到观念的传播，到政治的变迁，但凡文化现象，从人的角度看，是人如何制造、接受和传播观念与行为；从meme的角度看，则一切均是其经由人这种宿主的自我复制。

与基因一样，人生而无往不在meme之中，要识别那些于人有害的meme，没有简单解，如同在航行中修理船只，只能时刻警醒，检测寄生于己的所有meme，循环往复。Stanovich在书中有四条原则性指引：

第一，拒斥那些会伤害人身的meme。比如，不因牛仔之阳刚就被烟草广告吸引，也不接受那些主张杀人或自杀可以进入天堂的教义。

第二，选择那些能如实反映真实世界的meme。求真，不接受虚妄。

第三，拒斥那些排他的meme，无论是狂热爱好、信仰迷狂还是意识形态专断。

第四，拒斥那些拒斥检测的meme，没有什么能免于理性的反思与检测。

超越刍狗的命运，这是持续终身的旅程。

致读者

打开本期周刊，你会发现很多变化。

首先是形式。版式更清朗大气，字号也调大了一些，对眼睛更友好。终日埋首于手机屏幕，你没有必要被杂志上通常的小字体再折磨一次。

话是这么说，但你也好财新也好，都在拥抱移动设备带来的新可能。你追求更多由自己决定何时何地消费何种内容，财新追求内容生产、表达与传播的新空间。

如果你读了一篇报道觉得不错，想要读到作者的更多报道，扫一下署名前的二维码就行。钱钟书说吃了鸡蛋不一定要认知下蛋的母鸡，他不懂得食髓知味是人的天性。如果你对本期社论击节赞赏，为什么不扫描进入胡舒立的财新网个人主页？如果你觉得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文章很重要，为什么不扫描二维码一举收获财新有关周小川的全部报道？财新几乎每年对周小川作一次专访，留下了中国货币政策多年来的全部演变思路，这些知识财富，距你只有一指，不用再望杂志而兴叹。手机-周刊-财新网，形成一个优质内容的价值环。

《纽约时报》是新闻专业主义拥抱技术进步的典范，其当家人小苏兹伯格说，《纽约时报》不再是一个有网站的新闻报纸，而是一个有报纸的新闻网站。这种视野今天也变得不够了。纸上网上手上，就该统统水乳交融，何必言主客？何为主何为客，应该取决于读者。职业新闻工作者在乎挖掘与通达，不在乎介质。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新闻业的O2O为财新打开了新可能，陆续有来。

财新文章一向偏长，我们从未觉得是个问题，完整透彻的报道需要空间。谁会抱怨《纽约客》的文章太长？同样，财新年度力作《周永康的红与黑》洋洋6万字，谁会嫌其太长？长度不是问题，能不能达到质量才是问题。未来，这本周刊上的报道长度平均还会增加，短平快的内容不再适合纸上表达，我们专注于更深更广更透彻的报道，要确保你读得酣畅淋漓。

形式、介质、长短，什么都可以变，惟有好内容不变。财新团队所长，不外乎做最重大复杂的报道，采访最难采访到的人物，并作全球化广角观察。身为新闻工作者，我们何其有幸，与所处的剧烈社会地壳运动，相符若契。仰观星空，俯查蜗角。这是新闻工作者最好的时代，我们同在。

阅读愉快！

写作之难

The Sense of Style

Steven Pinker

Viking Adult, 2014-09

中国人重视写作，却很少有可行的写作指引。从E. B. White到Stephen King，再到William Zinsser，英语文法家们看法相通：好文章得清楚、简单、简洁、准确。写作是一门手艺，得训练。修改是写作的核心。中国人首次读到这些常识，往往醍醐灌顶，因为中国人写作讲究加法，而这些建议都是减法。

不过问题还在，怎么写文章？光靠减法可写不出文章。

所以要推荐Steven Pinker的新书。Pinker是美国一流认知科学家、语言心理学家，也是一位极好的作者，拿过普利策奖。他认为传统写作指南过于拘泥已经过时，志在以认知心理学的成果，系统重理写作指引，所以本书书名暗战The Elements of Style，而副题为“21世纪思考者的写作指南”。语言有差别，但人类认知的机理是相通的，也因为此，书中大多数写作建议有普适性，也适用于中文写作。

“写作是将网状的思想，通过树状的句法，组织为线状展开的文字。”Pinker一句话，道尽写作之难，也打开了写作之门。

对恐怖主义的回答

恐怖主义是暴力的另类。大多数暴力或多或少因人而起，而恐怖主义无视个人。恐怖分子无差别地杀伤公众，自己也不过是自愿的炮灰，他人更只是枪弹有待击穿的对象。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恐怖主义则反于是：目中无人，只见手段。屠杀仅是用来表达抽象政治诉求的符号，本质上是表演，用人血作谱。

滥用暴力，恐怖分子并不是武力值高，而恰是武力值低，所谓恐怖主义是弱者的反抗，所凭借的只是武力值高的对手选择不降到与他们一样低的人性值。但这凭借并不可靠。美国是民主的灯塔、自由的堡垒、宪政的中坚，“9·11”之后，也有关塔纳摩虐囚、中情局全球黑狱网络、不请自来的无人机。

暴力的循环易进难出，层层加码。恐怖主义不由分说地把不同群体拉入暴力的恶性循环，使葆有多种可能的群体间关系迅速降维，让鲜活的一个个生命，变成无差别的一缕缕灰烟，让震惊之余的芸芸众生，在恐惧的驱使下，迅速选边站。

杀人是恐怖分子的手段，让人群相互贴标签是恐怖分子的目的。反击恐怖主义，以暴制暴，有政府在。除此之外，还原死于恐怖袭击的一个个生命，重温其鲜亮与活力，拒绝将人命视作数字，在试图湮没一切的野蛮力量面前，坚持充分展开自我并尊重他人的充分展开，是每个人对恐怖主义最响亮的回答。

为什么摆脱不了资源诅咒？

油价连跌几大关口，此刻已到60美元以下。俄罗斯外汇储备迅速消融，卢布加速贬值，开始抛售黄金储备，金融稳定已成问题，经济冲击更不需言：苏联至今，这个国家就没有摆脱过对资源的依赖。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出口换汇萎缩，无力支撑庞大的军事-工业综合体。1998年俄罗斯宣布国债违约，震动全球金融市场，恰与原油价格跌到每桶10美元同步。今天时势的走向也有相似之处。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之后，一位国际观察家说，俄罗斯不会成为西方心腹之患，因为经济太脆弱，油价一跌，离游戏结束就不远了。

这些都不是秘密。普京政府非常了解。在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易位的那一届任期，俄罗斯经济的主题词与中国一样，也是转型。俄罗斯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也明了自己终将受困于其价格跌落。没有一个资源大国不明瞭大宗商品的强周期，为什么还是眼睁睁看着预料之中的灾难到来呢？

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许多资源大国经济发展受困，所谓“资源的诅咒”。资源易得，富资源国从上到下过度开支，而资源价格起起伏伏，储藏有时而尽。晴天做预算，决算在雨天。更深一层次理解，则会看到资源经济与资源国的制度之间，往往有一个相互加强的循环，威权体制+资源经济，两者互相依赖，彼此加强，难解难分。资源开采与政府攫取，动词的英文都是extract，并非偶然。

走出资源诅咒，关键在于制度。俄罗斯没有走出去，关键也在于制度。一个国家的命运，何其之大，不应与资源价格绑在一起。

棋人无疆

少年去国，离开积弱多辱的故乡，来到杀机四伏的敌国，师夷长技以制夷，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终成昭和棋圣。无论懂不懂，下不下围棋，中国人普遍膜拜吴清源，正因为这个故事感染力之强，有梦想、卓越、抑扬、家国、情怀。打败外国大力士是那个时代中国武者和看客的集体意淫，而一介中国少年在日本人最擅长的国技上实实在在地降服日本棋手。中国在战场上屡败，少年在十番棋上不败。谁不能被打动？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与《吴清源》，前后相隔30年关于吴清源的两部电影，以及中国电影电视文学中展现的两国枰上相争，无论与吴有无直接关系，依托的是这同一个叙事逻辑：国运沉沦，以棋报国。

围棋不应承载这样的厚重。

吴清源，1914年出生于已衰败的福建望族。父亲吴毅留学日本，带回棋具棋谱，教会他下棋。1925年父亲病逝，吴清源成为段祺瑞门下棋客，以棋养家，天才声名播至日本。日本棋界大豪濑越宪作在棋界门户之争中，对抗本因坊秀哉名人一门力不从心，有意别出机杼，延纳异国天才少年，游说政治家犬养毅及大财阀大仓喜八郎支持，吴清源于1928年举家东渡，入濑越门下。

从此，吴清源盘下的人生沉浮，被历史和他人推着走。只在棋枰之上，吴清源是自己的主宰。赴日仅五年，他就杀到本因坊秀哉座前，在历史性一战中，挟发明新布局的气势，祭出“三三·星·天元”布局，肆意纵横，视日本围棋小目开局的习俗如无物，视名人之威势若无睹，虽败犹荣。秀哉虽赢下有争议的一胜，但日本围棋的诸多戒条就此一泻千里。

围棋是最自由的游戏。棋分黑白，纵横19路，气尽则亡，子多为胜，同形不可再现。寥寥几句道尽几乎全部规则，而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好棋手注定自由，而吴清源在棋盘上展现出最大的自由，觑单关角，折二，顺势挡下，俗到令人惊叹的类似实用手法在吴清源全集中比比皆是，令日本棋人感喟再三。异乡的胜负人生有进无退，胜则有生路，负则无后路，在人生绝处，逼出耀眼光华：胜负面前，习俗不重要，棋形优美不重要。埋首一尺棋枰，忘却此身何处，对手是本因坊秀哉名人，可以祭出坊门禁手；

对手是好友木谷实，可以对面不知其激战中鼻血迸出。吴清源著名的平常心之论，不是云淡风轻坐而论道，而是在棋论棋，胜负之外，不知其余。

从1939年首次十番棋中战胜木谷实开始，吴清源统治了日本棋坛近20年，以十番棋为舞台，将同代大棋手一一击败，并无一例外地降级。日本围棋的下一代王者坂田荣男居然被降至让先。直到20世纪60年代，吴清源才逐步淡出争战一线。

吴清源开创了围棋游士的时代，这是近代以来围棋最动人的篇章，胜负指引人生，棋枰跨越国界。多年以后，濂越又收下一位异国天才少年，来自韩国的曹薰铉。再后来，曹在1988年第一届应氏杯决赛中意外击败聂卫平，随后率韩国棋手牢牢压制日本和中国棋手20年。濂越的第一位异国弟子终结了日本传统围棋，第二位异国弟子终结了日本围棋的霸主地位。

吴清源之后的游士传承仍在继续。1952年，10岁的林海峰自台湾赴日，入吴清源门下；再十余年，林海峰粉碎坂田荣男“没有30岁的名人”豪言，攀上日本围棋最高峰；再过数十年，10岁的张栩赴日，投入林海峰门下，并在本世纪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统日本棋坛。今天的日本围棋已然衰微，但这里一直是中韩围棋游士最丰饶的哺育之地，薪尽火传。

来自中国的当代棋人，有着同样颠沛与眩目的游士生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第一位女九段芮乃伟脱离国家队的编制与支持，先赴美教棋，后赴日投入吴清源门下，终于得到师叔曹薰铉的帮助，赴韩国参加棋赛。在韩国围棋极盛的顶峰，相继击败李昌镐、曹薰铉，获得国手战冠军，创造不可思议的战绩。今天，流浪20年后，芮乃伟归国，以知天命之身，激战于90后的棋手之间，以围棋为生命，不知老之将至。这是围棋游士们的宿命。

自陈毅说过“国运兴棋运兴”，人们便习惯性地 will 围棋与政治相连。但围棋应该是单纯的，吴清源恰是个单纯的人。他攀上围棋顶峰，但绝不是民族英雄异国扬威的故事，而是中日棋界合作的成果。他两入日本国籍，还曾围棋劳军，既不通政治也无所谓民族，智慧也好，血气也好，情商也好，棋枰之下的吴清源几乎是零。他的一生价值，只在棋枰之上，因单纯而自由，恃自由以尽变，惟其尽变，充分燃烧。今天的围棋空前自由，始自吴清源。

2014年11月30日，吴清源逝于日本。

知识无价

有这么一家神奇的网站，按流量是全球第五大网站，每月活跃用户5亿，页面点击数十亿，由用户生产高质量内容，完全UGC，绝对轻资产。这家网站估值多少才合适？

它是一个公益事业：手捧金饭碗，但靠捐款生存。

“商业是好事，广告亦非恶，但它们不属于这里。”创始人Jimmy Wales这样说，“Wikipedia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像是图书馆、公园，也像是心灵殿堂。我们在此思考，学习，与他人分享知识。”Wales说，创建Wikipedia之时，就决定做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不发广告，不事商业。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每年都恰有够多的捐款使它能运营下去。“很多使用Wikipedia的人在得知它是由非盈利组织和捐款下运作后，都十分震惊。”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由于是分享而不是生产一手内容，Wikipedia也许永远也不能成为学术论文的引用来源，但它正成为越来越多人获取入门知识和学科框架的第一站，所使用的语言已增加到了287种。

把知识带给全世界任何一个需要它的人，我愿意为这样的使命捐款。

世界越来越不平

“世界越来越不是平的，你们正攫其锋。怎么办？”今年9月的天津达沃斯一场对话上，我问高通公司执行董事长保罗·雅各布。他笑笑说：“我们从来没相信过世界是平的，世界一直群山环抱，而我们处于其中一处山顶。”

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流行十余年后，世界越来越不平这一点越来越清晰了。美国公司们在中国受到反垄断调查，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插曲。

政治，从东欧到太平洋西岸，处处多事，普京声称不排除对欧洲断气，中日在东亚竞逐。历史没有终结，只是换了一个时空继续。各自选边站，初露端倪。

经济，“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日渐耗竭。1991年到2008年间发达经济体整体的高增长结束，而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释放出的澎湃动力也已兑现。如果说以前世界各国经济比的是谁表现更好，那么金融危机以来比的则是谁更不烂一点。金融危机来临之时，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确有过协调之力：大家同步放水。如今危机已去而经济表现各异，各国财政货币政策转为各行其是：美国退出QE，日本在原本史上最大的货币宽松之上再度加码，中国则以金融维稳为要务。更意外的是，这个不确定性正在增加的世界上，黄金价格却在暴跌。谁敢说自己看得懂这些逻辑？

范式变迁已经来临，绑好安全带吧。

写作即对话

“把网状思考，通过树状短语，写成线状字词串。”斯蒂芬·平克新著《风格的感觉》一句话，道尽写作之难。

做了多年编辑，看过太多劣文。为什么人人都能写好情信、家书和日记，但要依据事实写好文章就那么难？

我读过许多写作指南，包括写作圣经《风格的指南》、William Zinsser的《如何写好文章》、斯蒂芬·金的《关于写作》。他们植根于英文写作传统，推崇清晰、明快、去雕饰的文风：把不需要的全去掉。这对中文作者的写作观念是个震动。

然而问题还在：到底怎样写文章？这些英文写作指南多谈词法句法，偶然谈到章法，几乎不涉及文法，中文作者实用借鉴有限；也正因为此，《风格的感觉》可谓带来了跨越语言藩篱的写作指引。平克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语言学家、认知科学家，融合认知科学、心理学研究成果，汇成这部“21世纪思考者的写作指引”（副题）——认知特点是共通的，所以写作有普适性的好方法。

如何在网-树-线之间如履平地？平克推荐古典文法：写作就是与读者基于视觉意像的对话。“作品开始于作者的叙述，完成于读者的阅读。写作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作者引导读者的视线，使其在字里行间发现作者已经发现的东西。展示，但不说。”

试试这个古典文法，在情信、家书和日记之外，把文章也写好。

经济的任务是维稳

这一头，降低正回购利率、SLF、SLO、PSL……传说中的和真实的央行定向宽松举措纷繁，一再引发市场波澜。那一头，“说降息就是对改革不信任。”“未来定向降息或定向降准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新华网与人民网两大官媒释放针锋相对的信号。

纷扰之际，何去何从？

人们通常会高估一件事的短期影响，而低估其长期影响。中国经济近年最主要的议题，在于杠杆如何去，负债率如何降，坏账潮如何避免。发生在经济决策过程中的最大变化，则是经济与政治议题的紧迫性易位，应对方法也易位。

非常简化地看中国政经议题的关系，可以说，上一个十年，经济狂飙，而政治维稳；从2013年开始并将延续到未来的这一段，经济则要维稳，为政治突破留出空间。这个突破以反腐为先导，试图建立有效率的、清廉的、更强有力的政府，再重定义它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经济要维稳，而稳定的指针已变。就业不再是紧迫问题。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竭力“保八”以保就业。今天经济维稳的重心转向金融稳定：有序的债务违约允许出现，大规模的债务危机不容发生。在此前提下，经济增速是7.5还是7还是6.5，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个水平下的债务挑战可以从容应对。这个过程无从预知，必然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政策波动将陆续有来，但它不会越出这个目标已然易位的新格局。

这就是新常态。

何必降薪

央企高管薪酬，本是国企改革诸议题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居然成为近来舆论热点，原因倒也简单：

第一，许多央企是行政垄断企业，几乎注定赚钱，换谁来都差不多。高管何德何能，要领高薪？中石油集团从去年以来屡发大案，众多高管纷纷落马，对中石油业绩并无影响，其股价亦未受冲击，显示市场对这些高管于公司的价值已有估值，微乎其微。

第二，央企高管高薪，在体制内部也有摆不平的地方。央企高管成为高级政府官员的机会，近年有增无减。同在体制内部，假设一样清廉，有人出身央企，则高薪先拿，转换轨道，再做高官；有人出身公务员，则官至部级亦不过万元薪酬，自然有意见。

第三，官人降薪，老百姓总归是支持。

尽管有这些原因，高管降薪不是治理央企的好办法。权力过大与合法收入过低这一组合，是制造贪腐的灵药。节制央企高管的正道，不在于硬性降薪，而在于节制权力。需要改革的，是半市场半政府二轨体制在央企人事上的尾巴，要关上央企高管与政府高官之间的旋转门。让央企回归市场，从市场中挑选高管，并由竞争决定其薪酬水平。在扭曲之上再制造扭曲这种事，该打住了。

从一战学什么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一个月后，以德奥为一方，英法俄为另一方，欧洲强国彼此宣战，战场从欧洲席卷全球。这场战争，标志着民族国家形成后数百年间维系欧洲的力量平衡战略崩溃，后人称之为“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看做一战的延续。在这一视角下，巴尔干火药桶、奥匈帝国的冒险主义等，这些具体的导火索重要性下降，而一二战以全面战争解决德国崛起问题这一点，再明显不过。

历史不会简单重现，却有很多启示。

第一，经济全球化与经贸往来密切不能阻止战争。一战前的经济全球化水平已经很高，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贸易占GDP比例，直到近年才恢复到当年的水平；英德之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但这未能阻挡两国开战。

第二，现代战争毁灭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想。德皇在开战后表示战争会很快结束，事后看错得离谱。大国之间的现代战争不再只发生在职业军人之间，无处不是沙场，大国不再能指望迅速地低成本地战胜另一个大国。总体战、焦土战，现代战争没有传统意义的赢家，各国人民都是输家。

第三，玩弄战争边缘（brinkmanship）政策，就会有失去控制的时候。战争有其自己的逻辑。从开枪走火到全面战争可以有无数级台阶，似乎每一级台阶都可以叫停，但战争有了一步就跨越所有台阶的能力。

第四，崛起大国的路不能越走越窄。俾斯麦德国与俄奥均结盟并向英国示好。俾斯麦说，棋盘有32格，格格都可以走；但到德皇威廉，与俄疏远，与英国相争，最终只有一个盟友奥匈帝国，而这个队友直接把德国拉进了一战。

医患出路

“医生遇害，社会的反应是分歧的，现有建制的应对是瘫痪的，制度的调整是没有的，技术上的保护是跟不上的。医疗矛盾集中于医生，是自掘坟墓的。”

两年半前的这条微博发在一件悲剧发生之后。2012年3月23日下午，17岁的李梦南持刀冲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刺死年仅28岁的王浩，此前与李无任何交集。本刊报道《刺医》编发之时，加了副题：弱势病人刺杀无辜医生，中国医患冲突悲剧自此极矣！

自2011年9月15日一病人在北京同仁医院挥刀以来，中国医患关系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同仁医院惨案引发举国震动，到今天惨案多得令人麻木，数年来变化，制度层面没有，社会分歧依旧，就只是医院多几个保安，医生戴过几个头盔。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冷漠，医疗体系对于患者病情和治疗信息的极度控制，往往是悲剧的导火索，在医患关系紧绷压力下，走向恶性循环。

医改不前，医生和患者承受其后果；两个群体相害，更是莫大悲剧。医改千万头绪，多年不前，要斩开Gordian之节，必须着眼于增加医疗服务供给，为此必须充分放开准入，激励各种形式的医疗投资，首先是民间投资。其他都是细节。

鼓励投资，放开准入，增加供给，对患者冷漠的医生，为营利盘剥患者的医院，仍然存在；真正重要的是，那些有尊严地对待和医治患者并得到得体收益的医生和医院，得有存身和发展之地。

激励六要

无论在说到一个人、一个组织还是说到一级政府的时候，人们通常总会说其应该做什么，很少会说怎么去做，几乎从来不会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如果实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答案常常是：因为这样做是对的。

这与Steven Levitt的告诫恰恰相反：绝对、永远不要以为人们仅仅因为某件事是对的就会去做。这句话来自其Freakonomics系列的最新一本《不同凡想》（Think Like a Freak）。

Levitt是克拉克奖得主，美国少壮经济学家的中坚。克拉克奖颁给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得主许多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Levitt这样定义经济学方法：用数据来研究激励怎样影响行为。激励被放到了最核心的位置。不考虑激励的公共政策是不可能有效的。

书里，Levitt列举了几条激励须知。

第一，搞明白人们事实上重视的是什么，而不是他们自己说重视的是什么。

第二，激励要对别人有价值，同时对自己的成本低。

第三，注意别人对激励的反应，如果反应出乎你的意料，要从中学习，并换个方法。

第四，要尽可能使用那些能使零和博弈转换成正和博弈的激励。

第五条前面讲过了，在此重申：绝对、永远不要以为人们仅仅因为某件事是对的就会去做。

第六条，总有一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搞出一些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招，把激励拿走把成本留下。哪怕只是为了自己不要被逼疯，你就最好还是赞赏他们的天才，学习教训，诅咒贪婪是没有用的。

与此对照，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官员几乎总是懂得这六条，但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未必如此。为什么？

反恐战争论

互有疑虑的族群关系、分裂主义的政治诉求、针对政权机关的暴力袭击、屠杀平民的恐怖主义，这是四个层次的挑战，如何对之？

战略上须首重综合，四层兼顾，环环相扣；但在战术上必须首重区分，每一层须不同对策，不能混成一锅浆糊，那样既没有精度，更夸大难度，因族群矛盾一时难解而产生对反恐前景的悲观失败情绪。

处理族群关系，以平等为要；应对分裂主义的政治诉求，以政治斗争为要；防备暴力袭击政权机关，以同等烈度的武力打击为要；打击恐怖组织，以斩首行动为要。

反恐主要是政府职责，在民众这一侧的作为，以建立分级预警机制为要，在反恐的保密要求与民众的知情权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为民众赋权赋能，提升其应急能力，但不宜发动民众上街反恐，也不宜长期限制民众正常生活需求。

赢得反恐不能靠防守。在显要位置高调部署军警，可稳定民心，但对反恐用处有限。处处安检一时有效，千日防贼不是办法，民众生活方式改变有成本更有极限。成功反恐必须要把战火引向恐怖分子。屠杀平民的恐怖行动，突破人伦底线，在任何族群内部的支持基础都极稀薄，斩首行动必会有效，无须夸大斩一首再长一首的可能性。拉登被海豹队干掉了，何曾见到千万个拉登站起来？

主动出击，精准斩首，须依赖国际支持，特别是情报交流与跨界行动许可。区分前述四种不同性质的挑战，有助于区分并最大限度地孤立恐怖分子，重击恐怖分子本身也才能获得普遍国际支持。“9·11”之后美国总统布什对其他国家说，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起，要么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固然是因为美国势大气粗，也跟屠杀平民是非分明没有其他政治解释空间有关。面对反人类的恐怖主义，你当然只能跟人类站在一起。中国也当发出同样的声音。

保持弹性为重知止为上

中俄上周缔结了21世纪以来的第一大交易，30年每年380亿立方米总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进口合同，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分，价格俄方说保密，财新本期文章《中俄天然气世纪交易》推算约合每千立方米380美元至390美元，高于预期。

乌克兰事件以后的各国选边站，分水岭在上海。中俄联合声明，要“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更高水平”。中俄之间不再仅仅是相机合作，短期合作，偶尔同声相应，而是正加速做实为真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国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均衡棋局，正走上一条收敛的轨道。中国与俄罗斯的能源与资源互补关系，合作前景固然有吸引力，但近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全球经济不振，能源与资源的市场博弈中，时间在买方一边。更何况美国页岩气革命后，能源独立在即，重写全球能源供需方程式。中国本来有理由更从容。此次决断，更折射出中国决策精英们对于中美关系走向的悲观预期，足以令人忧虑。

普京是大赢家。受西方孤立的局面暂时扫清。俄罗斯本来对欧洲打能源牌，伤人以伤己为前提，而今锁定中国出口市场，在欧洲与中国间左右腾挪的空间大增。又兼中俄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五占其二，无论政治与经济，俄罗斯暂时无虞。

“冷战”结束20年余了，国际政治格局终于又出现回归极化的苗头。这条窄路，各方都不宜一条道走到底，保持弹性为重，知止为上。

怎样管理自己的情绪

同事张进正在财新网连载抑郁症博文，追读之时，我意识到有更多人虽距抑郁症还远，但时常受情绪低落袭击，焦虑，烦躁，易怒。怎么办？这个我来回答。

好心情是自我选择的产物。神经心理学实验发现，人可以不是因为开心所以才笑，可以是笑着笑着就开心了。身心一体，情绪的变化首先反映身体状况的变化。管理好身体是管理好情绪的前提。适度锻炼也有利于心理调节。

确保足够睡眠。哈佛大学教授Sendhil Mullainathan新书Scarcity援引实证研究称，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则智商会下降10%到15%，等于从正常人变成轻度智障。而情绪的自我管理能力只会下降更多。

适度锻炼、足够睡眠之外，毕竟还有诸事烦心，如何处之？从分类开始。

第一类是琐事，易做但要占用大脑内存。要善用智能手机上的日历、备忘录、闹钟和位置服务功能，让工具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提醒该做的事即可，尽快从大脑中清空。

第二类是复杂事情，这一步已完成但下一步尚未发生，要待特定时间或者特定事件激活。要用工具将这类事情的激活设置设好，然后也清出大脑。对有步骤的事情要对之以有步骤的管理。

第三类是自己无法影响的事情。想亦无益，不想最好，乐天知命。

要坚持分隔式思考。潜水艇船舱之所以相互隔离，就为了在一舱进水时封闭起来潜水艇还能航行。管理情绪也得学会分隔式思考。一件解决不了的事，要及时在大脑中给它打上封闭。

最后，要多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诺奖得主Daniel Kahneman说，与喜欢的人在一起就会快乐，在一起时间越长就越快乐。对普通人来说，工作之内是与老板在一起；工作之外是与妻儿在一起。要找对老板，找对老婆。

总结一下：适度锻炼，足够睡眠，善用工具，有效思考，尽量与喜欢的人在一起，可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并远离抑郁的阴影。

读书六问

轮值这一期周刊，正值世界读书日。我是个读书人，自问自答。

读书了不起吗？读书只是个分配时间的决策，只存在适合不适合的问题，不存在读书更高贵的问题。有人从来不读书，但对人对事的判断有穿透力。不学而知，岂不是更高明？我适合读书：喜欢，有比较优势。认识自己，理解社会，读书对于我是捷径，我走捷径而已。

读什么书？这个问题既无答案又有答案。一方面，读书不可能有普适答案。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中文著作，不能与西文著作相比。中国如果能像现在这样再走20年，世界一流的学问和学问家会大量出现。但当下读什么书是有答案的：不要读中文书，要读西文书，首先是英文书。

为什么读书？小时候，读书是为读而读；大学时代，读书是为了做学问；工作以后，才是真正为兴趣读书：为认识自己，为理解社会，为解决问题，而读有用之书——终生学习，学以致用。致什么用，人人不同。

为什么有互联网还要读书？有互联网+google+wikipedia，极而言之，可以不读书，前提是能自由地产生问题意识，要有超强学习能力。这种人少见。大多数人还是需要读书，与现实观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普通人的出路。

读书需要什么？我读书到后来都摸到同一个天花板。数学不行，结果痛苦。忠告各位读书人，如果还在大学，其他课因人而异，一门英语，一门高等数学，要学好。

读书跟做人有什么关系？在读书中我们与历史血脉相连。天行乾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诚意正心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的一条主线。天命在我，则是儒家的另一条主线。前者刚健后者骄妄；前者君子儒，后者小人儒。两者之分，惟危惟微。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

不稳定动力学

从乌克兰到台湾，街头运动再度勃兴，暂且不论其不同原因与诉求，其动力学可用一个极简模型分析。

假设一个社会从最不满意到最满意所有人排成连续序列，他们要走上街头抗议所需要的条件也构成一个连续序列。最不满意的那个人不管别人怎么样都要走上街头；不满意程度仅次于他的人，如果没人上街则自己也不会上街，但只要有一人上街就会跟着上街；依此类推，98个人上街了，第99个人也会上街。这时要对付的只剩下最后一人。此之谓独夫。

这模型跟善恶、是非、历史、民族无关。在模型中，社会永恒地不稳定。真实世界当然远为复杂，结果不注定，过程也不平滑，多出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是临界点。没有越过临界点的街头运动自生自灭，越过的街头运动将变得难以对付。极简模型中的临界点是第一个人；真实世界中的临界点需要足够数量的人，多少则因社会而异；定性地看，从学生上街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也上街那一刻，就是临界点。第二个关键点是赛点，参与街头运动的人群数量超过赛点，则滚雪球加速，原体制被终结的命运无可挽回。

现代社会首先走上街头的往往是学生。有人说这是因为学生最容易被操纵。这个极简模型提供了另外的解释：比学生更年轻的人群，还在承欢膝下，不是一个政治因素；比学生更年长的人群，有工作有家庭，上街得有其他人先上。无论是在哪里，学生都并不幼稚，只不过是表达不满打破旧体制成本最低的那一群人。